

##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斗争，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八七会议的功绩是主要的，使党前进了一大步。它的主要缺点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倾向，从而助长了“左”倾错误。

一九八七年是八七会议的六十周年。为了满足党史研究、教学和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这次会议内容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本《八七会议》。编入本书的主要资料有会议文件，会议上的报告和代表性的发言，会议前后的中央有关文件，中央后来对这次会议的正式评价，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等同志的回忆和评论。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

为了保持历史文件的本来面貌，保证资料内容的准确性，本书所选文件都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进行了核对，并对原件中明显的错别字和缺漏字作了订正，订正之处用〔 〕标出，衍字用〈 〉标出。原件印刷不清或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地方，用□标

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对于文件中的一些化名、笔名、名字简称、生僻词句及著述时间作了简要的注释。

李维汉同志生前曾对本书的编辑工作给予关心和指导。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帮助。湖北省武汉市文物管理处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图片和访问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为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规划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之一，参加具体编辑工作的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陈文斌、杨西岩、卜伟华，中央档案馆的朱世荣、张景堂。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



八七会议会址——汉口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  
(原三教街四十一号)

八七會議會址

鄧小平題

一九八〇年五月廿日

鄧小平題字



八七会议会场



# 目 录

## 第一部分 八七会议文件

小引.....	( 3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 5 )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 38 )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	( 41 )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 44 )

## 第二部分 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和部分发言

李维汉的开幕词.....	( 48 )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	( 49 )
李维汉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 56 )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 57 )
邓中夏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 59 )
蔡和森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 61 )
罗亦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 63 )
任弼时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 65 )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结论.....	( 67 )
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的报告.....	( 69 )
毛泽东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	( 73 )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	( 74 )

### 第三部分 八七会议前后的中共中央有关文件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75)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 (84)  
    ——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
- 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 (90)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93)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102)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 中央答复山西省委的信····· (105)  
    ——采取暴动土地革命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
-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 (109)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
- 中央给湖南省委信····· (112)  
    ——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
- 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 (115)  
    ——关于成立南方局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 中央给山东省委山西满洲临委的信····· (116)  
    ——组织北方局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 中央通告第一号····· (117)



——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二号·····	（121）
——党的组织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125）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三号·····	（137）
——建立党内交通网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四号·····	（139）
——关于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五号·····	（142）
——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中央通告第六号·····	（144）
——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常委通过）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148）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	（153）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 第四部分 关于八七会议的评论和回忆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节录）·····	（161）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节录)..... (162)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节录).....周恩来 (163)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节录).....瞿秋白 (165)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 党的机会主义史(节录).....蔡和森 (173)  
 (一九二七年九月)
- 党史报告(节录).....李立三 (175)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
- 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李维汉 (181)  
 (一九八一年)

## 〔附录〕

- 关于八七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八六年二月)  
 .....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 央 档 案 馆 (195)

##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斗争，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八七会议的功绩是主要的，使党前进了一大步。它的主要缺点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倾向，从而助长了“左”倾错误。

一九八七年是八七会议的六十周年。为了满足党史研究、教学和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这次会议内容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本《八七会议》。编入本书的主要资料有会议文件，会议上的报告和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会议前后的中央有关文件，中央后来对这次会议的正式评价，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等同志的回忆和评论。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

为了保持历史文件的本来面貌，保证资料内容的准确性，本书所选文件都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进行了核对，并对原件中明显的错别字和缺漏字作了订正，订正之处用〔 〕标出，衍字用〈 〉标出。原件印刷不清或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地方，用□标

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对于文件中的一些化名、笔名、名字简称、生僻词句及著述时间作了简要的注释。

李维汉同志生前曾对本书的编辑工作给予关心和指导。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帮助。湖北省武汉市文物管理处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图片和访问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为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规划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之一，参加具体编辑工作的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陈文斌、杨西岩、卜伟华，中央档案馆的朱世荣、张景堂。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

# 第一部分

## 八七会议文件

---

### 小 引

自七月初旬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反动以来，本党中央政治局已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即派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独秀同志赴莫斯科商定此后之总政策。当时即先接受国际电令，宣言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即七月十三日的中国共产党对政局宣言。这一关键已是本党改变政策之开始。不久，国际方面又有电令来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但是，那时正是七月底的时候，时局紧急，因此，先由常委发出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可是也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一会议，到者有中

央委员十二人，候补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国际新代表出席报告召集这次会议的意义。虽因人数不足不能作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紧急会议，但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议事日程如下：

一、国际代表报告；

二、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三、党的新任务报告——分四项：

A. 追认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的左派国民党政纲

B. 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

C. 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

D. 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四、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结果，通过上述各议案，兹印布如下，并选举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七人。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一期）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告全党党员书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鉴：

## (一) 绪 言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他自己也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如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农民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只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受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革命的军阀一直到被革命吓慌了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现在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

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叛背了国民党的主义及其习性，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革命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护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那末，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灭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充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的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等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



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他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各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

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摇动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假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这些情形，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折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深，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能在五县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

史的一页。农民协会实际上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协会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分配土地于乡村贫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的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的努力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彻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作用。党的群众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摇动犹豫，没有坚决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的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导。

## （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争斗，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么，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类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及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实际上要使无产阶级变成‘民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的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又在维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破坏，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的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分。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

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别一方面观查，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之保存与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么，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为其所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被逼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于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改，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今年四月间既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他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经济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非常之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之最彻底最坚决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之争斗的发展，就是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的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的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并扩大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成分，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分，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利于城市工人乡村农民之胜利，自然更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程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而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反之，如果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彻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于有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摇动犹豫的人，他自己便应当开始就不摇动不犹豫”。我们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政策；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摇动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确定共产党的革命的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之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了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的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象孟什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的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月忽略反帝工作”。仿佛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要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C. F. ①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通信里还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

① 中国共产党一词的英文缩写。

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困难，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就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工人问题”而要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就是实行蒋介石四月十二屠杀的资产阶级，转向帝国主义求妥协的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和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



### (三) 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亦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期中客观上可能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轨道上去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至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阶级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之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领导工人每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力争增进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同时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农民，首先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织的成分。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的斗争是相应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斗争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他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及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之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起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正在资产阶级

领导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不是为工人的利益，实是为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了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禁止不得政府同意之外国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却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那时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利益，只有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限制他们直接的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农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那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念是错误的，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自然爆发而发展的工人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而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于是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不应当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制进行，中央都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他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小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国民党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

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个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是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亦是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经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秘密工会，而使他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阶级，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分子减少些，说中国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工人，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得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 (四)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进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

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土地，禁止苛约，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中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及于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之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刻刻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他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之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及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当第五次大会时，虽然土地问题的议决案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

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在这委员会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四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实行解决，等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于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正是湖南农民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地的时候！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的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为，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军阀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为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事挑拨离间。他们故为左倾之宣传，而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有些过火行动，亦许是反革命派故意挑拨出来的”。他还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须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地主军

闷，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中央的政策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既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政权交付了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着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识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中央坚决反对分地，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五月二十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行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五月二十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是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且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么，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

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再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二大队偶然没有接到这一命令，居然扑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是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争斗的决心，简直是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案：“现时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时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步〕，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来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行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了湖南政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对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的指导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伙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不革命的妥协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么，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 （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妥协主义错误铁束〔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如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的下层机关之活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取的态度，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上有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背，这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底下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要能担负起他的任务，只有他自己能做工人阶



级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就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都要有区别。

“共产党在任何政治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同。他应是独立的力量，他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他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派的动摇不定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在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由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组织。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国民党当前的任务，须要有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必须更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的工农与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除去反革命成分——工人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

“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他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漠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左派一部动摇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反对那

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即定出适当的宣传煽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

“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工作的影响。他要能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权”。

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和国际议决案上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取的立场，实际上说既如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他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致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为他自己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了与国民党“左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分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的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族运动发展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他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革命

的现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篡改，恐莫此为甚罢！

再此议决案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应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应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的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甚至于他的领袖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议决案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答复，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亦有这样说的：一方面固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百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然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政策。共产党的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彻底半途而废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彻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对此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虽国际之多次的督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

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不足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

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人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深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市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也不坚决的去反对湖南的叛徒；为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当他驱逐共产党的时候，亦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领袖之愿欲来确定的，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议决，虽然以前中央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的重要问题，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受我党指导的群众也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让步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须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前进并巩固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坚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只是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日常工作：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实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好听的自动解除武汉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日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七月三十<sup>①</sup>号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现在抽几条出来看看：

4. 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5. 国民党中的 C. P. 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 C. P. 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会议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时参加政府工作之 C. P. 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6. 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及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国民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7. 依照国民党党义得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8. 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捕人审判及巡逻市街等事。

9. 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改组，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10. 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这已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领袖去监

<sup>①</sup> 应为七月三号。

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这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甚么呢？

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与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的！这种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只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种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变〔背〕叛。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策略是对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变节。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

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他的力量与他的将来，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的下层群众，与他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谁能公开的反对此中央是国民党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自己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领导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确定。所谓与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知识阶级、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 (六) 共产党员之参加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行动上与党对于参加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如其他许多革命的主要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的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

“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连系是十二分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连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渐渐的巩固革命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劳动群众的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与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则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所摒弃。要时常的使政府工作与群众中的工作相连系，实是中国共产党必要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政府问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

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总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命〔令〕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的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豪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然无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村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之则“严罚”。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内，他们并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是公布的（劳动法草案，减租草案，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且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总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决议案应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连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了最滥的资产阶级官僚的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失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什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合适的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把他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的问题。谭平山同志上任后，第一件事情，就要打算“镇压”湖南的农民运动。对此，中央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次出征已经成行，但尚未至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些叛变很敏捷的很彻底的实现了谭平山同志所领导的出征之任务。

当谭平山同志结束他那不光采的总长任务时，还来个长期请假的退出，重新又丢党的脸一次。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国民政府境内巩固，当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了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趋



向，如此才可自由的完全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谭平山同志却很愿意去迎合反动军官与胆怯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脱身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行他的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动，反而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在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为“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

谭平山既因“病”而请了长假，但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总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逃脱还不够，而且重新还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些什么结论？即：1. 农民运动是走上不正的路了；2. 只有武力能纠正他，因为共产党员的总长有了共产党的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他的代表毫不受处罚的在政府内做了这些顽意，莫非这还不是共产党的耻辱？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的声明，没有发表过一句话。本来他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分，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总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见解，相差不知多远；在一九〇五年，当时俄国亦是同样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小册子中说：

“我们应当指出此政府的行动政纲，适合过渡的历史时期之客观条件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任务。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最低限度的全部党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的关系之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这是一方面；别方面就为往下的进行到实现社会主义……。

“可是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因为他是临时的，所以他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政纲；可是这种论调，只有反动的诡辩派及帝制党才会提出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不执行什么政纲，那就是让腐败的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度继续存在。对于这种制度，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才能容忍。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由下的去影响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为要求由下的来实行督促政府，就应武装起来……。武装督促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是在实现我们最低限度党纲之内的。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的斗争机关，是为赶快的揭发反革命的企图，而并不是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这种胜利就将是专政，就是他必须要依靠武力武装的群众暴动，而不是那些由和平方法得来的‘公开’机关。因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及农民所赶快急须的改革，必定引起地主与大资产阶级之残酷的抵抗，所以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破坏此抵抗与击破反革命之企图”。

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政策，却正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实现的！

## (七) 武装问题与对于军队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的趋向。

人人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极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只能暂时和革命相伴，都希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士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很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亦是非常之可耻的。湖南政变及其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的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的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助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六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每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限于这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

威反抗长沙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去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种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也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和他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反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是为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容些，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就使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间，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 (八) 党内问题与对国际的关系

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

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公开工作的地方，所谓党内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自然在这种党内情况之下，中央得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所以他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

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非常之奇异，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这已经不算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议决案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

## (九) 结 论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的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

党，这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个党员，极注意的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若不能受着过去的教训，便不能向前进，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

讨论之中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分，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性查一过，应当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

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多的帮助他的工作。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应当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势力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密的党的机关。

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渡过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号召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做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对于革命的忠实，必能使你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一期，并按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一书校订）

##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境域内有了广大的发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分依据军队的武力与国民政府的机关联合着进攻，给农民运动以很大的打击。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

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指导的摇动不定（由地方机关直至党的中央）是反映小资产阶级之动摇，客观上弄到破坏农民暴动。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

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组织之捣毁，农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随之而经济压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准备着新的革命爆发，比前次的规模和力量更要超越。

农民运动不得无产阶级政党有系统的革命指导，很容易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爆发，反动军阀可以不费力量把他镇压下去，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

- 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 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
- 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
- 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
- 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 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
- 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
- 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
- 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
- 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合作社等类办法)。
- 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国民政府所下的减租二五的命令，很明显的是现在国民党领袖之一种欺骗手段，因之，我们党对于国民政府之决议，应揭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案和命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现在已和对于新旧军阀的政府一样，本党必须引导农民反对他。对于每次摧残农民都要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尤其要经常的反对一切豪绅军阀御用的假农民协会。

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但是，并不是说是农民运动不免要起而反对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认为这种事情是过火的是反革命的。共产党应当力求农民运动之中能有最大的组织性，但是共产党决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咒骂“无政府行为”所吓退——不论自然爆发的农民运动走的如何远，都应当如此。因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再则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二期）

##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

我们革命已经到了最严重而向新的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方能使无产阶级真正获得领导权，而求达工农独裁之实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联合并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完成民权革命，而进于社会革命。

此种总的任务之下，职工运动目前的重要点，就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现在南京武汉政府，已经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仍旧打着国民党是革命的假招牌，还要说保护工农，维持工农等的欺人的空话。因此，他们尽着想法把持伪工会机关——其实这种骗术，多已暴露无遗。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反对这些政府，反对北方军阀的政府，对于他们摧残工会或所谓改组工会，都应当立刻坚决的号召群众起来反对。

职工运动中之现时所应特别注意的便是：

(一)工会应当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群众的组织，从一般工会机关直到全国总工会，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由群众所选举出来。现在各地如上海、南京、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以及最近湖北省总工会机关都被反革命派所占领或改组，全国总工会也遭同样的摧残。蒋介石、李济深、唐生智、汪精卫、陈公博等，派出御用走狗，把各地工会机关占领，这种冒牌的假工会，工贼工会，我们要尽力去反对他，各工会都要发宣言，示威、罢

工及经常的广大宣传，否认这些假工会，使个个工人都了解真假，并来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原有的真正工会。

(二)工会须由工人做领袖，反对一切反革命御用走狗侵入我们真正工会。因为这些走狗受了帝国主义资本家直接间接的指使，正在用各种方法来欺骗压迫工人；法西斯蒂改良主义同时并进。我们应当派少数得力同志参加假工会之中，做破坏的工作，拆散他们的团体，打倒他们的一切信用，遇有伪工会到群众之中活动的时候，便对他们提出工人的要求，以揭露其真相。

(三)本党应当领导群众力争真正工会之公开，实行工人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之政治斗争，再则工人阶级目前最急切的要求，便是经济问题，因为不但工人受着一般的经济金融恐慌及资本家的加紧剥削，而且反动潮流之下资本家必定向工人店员进攻，悔弃旧约，取消工人已得之胜〔权〕利。本党应当领导工人努力于反抗这种反攻及一切剥削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不但以改良工人生活为目的，而且可以增进工人的革命化，并强固其战斗力，决用不着怕工人只顾经济斗争而忘却政治，将来成为经济主义。现在中国情况之下，每次经济斗争，只要有共产党的指导，必然增进政治斗争的剧烈，经济斗争是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

(四)经济斗争之目前要求是：

一、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及店员至多不得超过十小时，童工女工至多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不做夜工。

二、失业的救济，应由国家及资产阶级担负（须将失业工人组织为有力量的团体）。

三、妇女产前产后应有八个星期（五十六天）的休息，照发工资。

四、同样工作，须有同样工资。

五、劳动保险及工厂工人住宅之卫生设备。

六、增加工资，并按照物质高涨照加工资。

七、工资须发现金，不得以信用低落的钞票或国库券等代替。

(五)现在职工运动在严重的压迫之中，各工会应有秘密的组织，以防反革命的摧残，而保存我们的实力；各地工运同志，党团支部，更须加以严密的防护，并绝对服从党的指挥，不能有丝毫疏忽。

(六)现时的严重压迫之下，工人更应当有自卫的秘密组织，然不要重视个人的暗杀政策，当注意组织群众的斗争。

(七)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

(八)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如果反革命的资本家闭厂怠工实行经济封锁，则工会应领导工人实行占领某工厂交于当地革命政府管理。

(九)应选有觉悟的工人到农村间去做农民运动，并可轮流派工人到乡间工作，使工农关系在实际上密切起来。

(十)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

(十一)职工运动中以后要更加多注意产业工人，特别是：铁路、海员、电报、水电、电话、邮政、运输、兵工厂等工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主要基础，并且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中他们是打破封建势力及在城市中的大本营之伟大力量。

(十二)职工运动是本党的基本工作，应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错误应以整个的党来指导他，所以各级党部之工人都应即取消，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经过党部委员会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中的党团。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二期)

##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

(二)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

(三)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同时须组织南方局于广东，至少须有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三人加入。

(四)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北方顺直省委(或北方局)，南方局，以至上海省委之下，亦应设立出版机关及传播秘密宣传品传单等工作。

(五)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六)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各级党部委员会，省委，市委，县委，区委都应当在最近期间改造成下列的方式：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中，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常务委员会——为指导机

关，由其上级党部机关批准；此等常务委员会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处分（一直到开除）<sup>①</sup>。各级党部都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如组织各式各样的学生团体，小商人团体，妇女团体，俱乐部等类之组织，利用尚未被封之工会等等，在这些组织之中组织党团，受党的严密的指导，各种伪国民党的下级党部之下，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

（七）秘密状态之中，保存工会的组织亦是最重要的职任之一。一切工会中应当速建立起党团来，人数不要超过五人至七人，须完全服从相当的党的委员会之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工会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同志担任这种指导。

（八）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停止职务，开除党籍等等）。

（九）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即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每一支部都应当分成五人至八人的若干小组，每组有一组长（并应有候补者），以与支部干事会联络（如支部之下尚有按生产部门的“分部”，则与“分部”干事会或书记联络）。各小组尽可能的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经过这些小组进行各该企业中（工厂等）的工作。

（十）每一支部之中，须挑出最可靠的同志——负责同志；支

<sup>①</sup> 这一段文字混乱，疑有误，但原文如此。

部干事会与负责同志应有特别的联络——应按期召集负责同志开会，或全部的集会，或代表的集会。

(十一)每一区的党部亦是如此，在小城市或村镇，则可由全体党部之中挑选负责同志，直接与市委或县委联络，经过这些负责同志，党部委员会即易指导该地全体的党部。

(十二)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这种审查不应带有清党的性质，而只是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以及可疑的分子。我们党应当在此过渡于秘密状态之际，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要使每个党员都不与党部脱离关系。

(十三)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党部转入秘密状态的关键，因为此处有好几千党员而大半都是没有经过秘密状态的，中央应当帮助湖北省委进行这种改组的工作而直接的督促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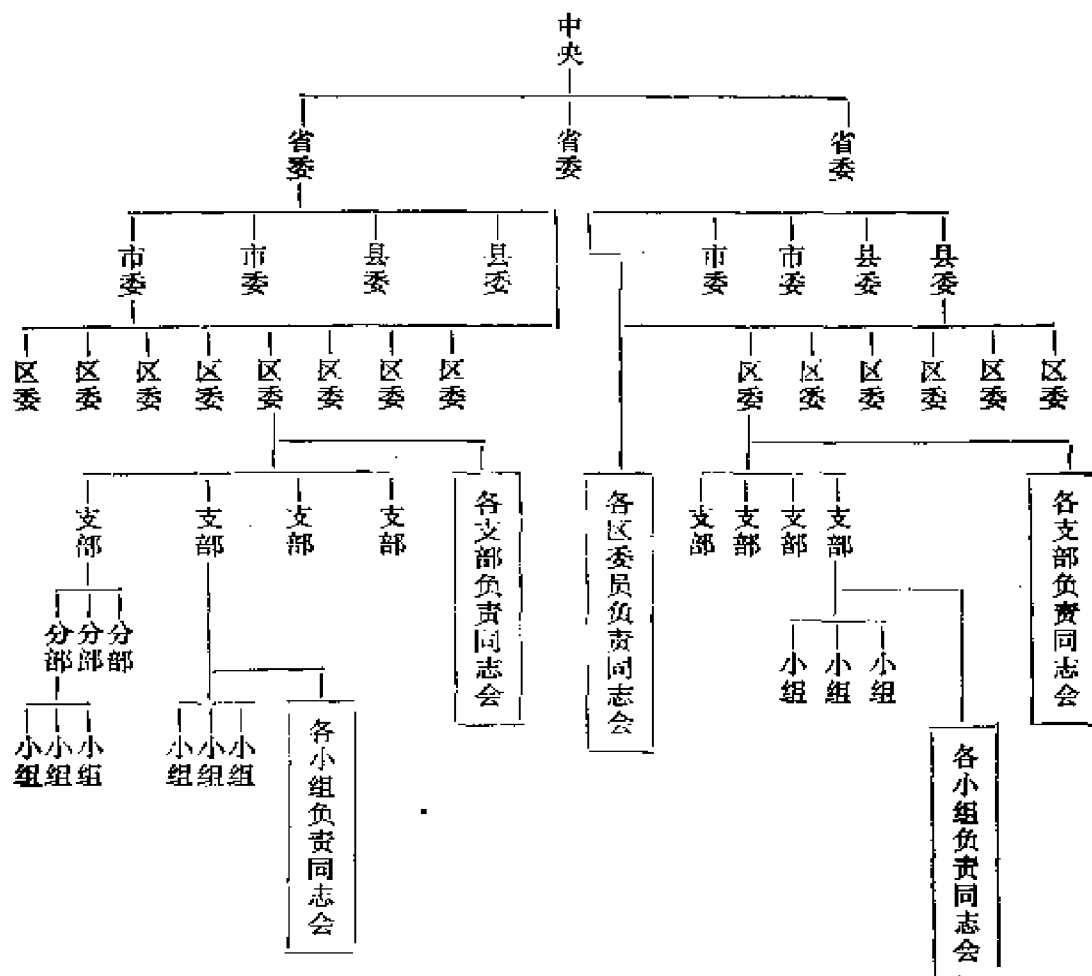
(十四)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份，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曾经在最近几日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

(十五)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最近党所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需要彻底的讨论，付〔应〕在群众之中加以审查，并根据之以审查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因此，不论如何严重的压迫，必须在本次会议后，设法极慎密的进行党内的讨论：先由支部讨论，然后在各省之区、县、市、省开秘密会议，详细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而根据这种讨论，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

(十六)党对于青年团的关系，须有极严格的变更。须切实实现各级党部与团互派代表的原则，——团部代表有表决权，并引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策问题之讨论。



附 表：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二期)

## 第二部分

# 八七会议上的报告 和部分发言<sup>①</sup>

### 李维汉的开幕词

宣布开会：在七月四日(十二?)<sup>②</sup>以后，国民党政府背叛以前，常委之组成为：特、恩、立、迈、大<sup>③</sup>五人，后特、恩、立到前方，现留的仅迈、大二人。在国际代表<sup>④</sup>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提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得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急会议。此会议原定七月廿八开，后因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今天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不过半数。此会议是一紧急会议，议程有三：

1. 国际代表报告——指出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

2. 常委代表报告——将来工作方针，过去我们与国际代表对于各种问题讨论得很多，并已提出草案。常委报告人已推定秋白。

3. 改组中央政治局。

今天的会只能开一天，发言请扼要。

---

① 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和部分发言均录自中央档案馆所存《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编者作了个别的文字订正。

② 原记为七月十二，又改为四日。

③ 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

④ 指罗明纳兹。

##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sup>①</sup>的报告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 P. 将不成其为C. P. 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党的指导与国际的指导及群众要求差得如此之远是非常奇怪的。

在国际中央看到的，在现在中国环境中召集此会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困难的。假使反动的国民政府知道我们在此开会，必定要将我们一网打尽的。但因非召集此会不能改正过去的错误，所以仍坚决的召集一些与群众比较接近的领导者来开此会。我们要指出过去的错误，并须使此错误为大家所认识。因为过去不但中央的指导者错误，而且各地方的指导者也错误。所以如果不将此错误使大家都知道都认识，仅有几个领袖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国际中央决议认为，此次紧急会议不仅是讨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现在的问题，是否此会有改组指导机关（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与各地的隔离，今天的会仅有两个地方的代表参加。但因现处于秘密环境中，故可叫以〔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治

---

<sup>①</sup> 罗明纳兹（一八九七——一九三五），苏联人。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参加中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一九二七年底回国。

局。此临时中央政治局有权通告全党，指出过去的错误及将来方针，并有权可以召集代表大会代〔或〕临时代表大会。

此临时中央政治局要得到国际的同意后，方能正式成立。

在今天的会议中，我们要估计过去的工作。关于此点，常委已提出一个很详细的告同志书，同时又因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报告中，只能指出重要的错误。

在未批评之先，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党过去的指导是照多数主义<sup>①</sup>及国际决议做去的，则现在的情势决不如此。这并非看过主观的力量而是客观的事实。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少、经验少，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其他任何阶级却都不能及他的力量之大。中国资产阶级是非常薄弱的，如无国际资本的帮助，则他久已倒了。中国的资本多在外人手中，外国资本组织了中国无产阶级。故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小。至于农民、小资产阶级虽多，但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他们不能领导革命。这般农民、小资产阶级不是跟着无产阶级走，便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在现在的阶级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是以阶级的力量来反对中外资产阶级了，其他任何阶级都不及他有力量。

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虽然，我们仍要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的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中他是革命的，现在已经反动了。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中国共产党两年来领导无产阶级已有许多斗争的经验，如果中央能有〔够〕正确的不动摇的来领导无产阶级，则中国阶级间的关系

<sup>①</sup> 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了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曾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这里的多数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

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局面；不仅武汉即其他地方亦不会有此反动的局面。

要考察过去党的指导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四月一直到七月底，党的指导都是照着改良主义去决定他的策略。他不但对小资产阶级即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也有很大的让步，对国民党的让步，甚至失掉了我们党自己的独立性。到现在他们要赶跑我们了，在街上杀戮我们了。我们的党为要阻止农民的运动，结果使农民运动遭了大的摧残，农民群众遭了大的屠杀。我们的党为要使工人让步，结果使工人运动大大失败。一直让步到党不能公开的成立。直到八月初南昌事变起，于是才开始有一坚决的转机。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后的情形一定与过去不同了，这是因为我们能坚决照革命路线上走。此次事变，我们多少有点武器。因此，我们如果实行坚决的革命策略，现时的环境一定与从前不同。

拿中央的理论及实际来看，他简直是少数派<sup>①</sup>的，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党，这是我们根据中国党决定各种问题而得到的结论。中国少数主义的基础是没有的，因为少数主义是建筑在工人贵族的基础上。如照中国〔党〕中央的路线上走则可说无 C. P. 了。好在中国工人阶级无工人贵族的基础，故无此危机，这从上海、广东、湖北的争斗我们可以看出，从武汉工人革命性之充分可以看出。他们的行为要不是照中央的指示而是自然的表现。好在中国党中央尚无集权的指导群众的力量，这实是过去的幸事。如此会是随便召集的，或群众与指导机关的意识是一样的，那召集此会为无意义。正因为群众与中央的指导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希望很快的将党的指导之错误改换过来。

---

<sup>①</sup> 少数派，即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只得少数票，故称少数派，后堕落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派。

在那封信里(告同志书)指出之主要的有中国革命之性质及在革命中各个阶级的作用。这种作用过去中央的认识可说是纯粹的少数主义的。他认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战线中必然要有资产阶级，不知资产阶级当工人运动发展的时候必然退出此战线，这是在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明明白白指出的。现在有两条路：一是仍然维持此民族统一战线而反工农利益；一是为工农利益而反此民族统一战线，这两条路我们要来找。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造出一些少数派的理论：以为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是冲突的，这我们根据六月中央给上海党部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信中，说要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可以不需要坚决的阶级斗争，并应号召第二次“五卅”。这无异乎是要拿工人去牺牲。实则工运愈发展，打击资产阶级愈厉害，阶级斗争愈剧烈，也就愈能打击帝国主义。

关于此问题，不但对于过去，即对于将来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我们要问：以后是否还应维持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总想戴些假面具，蒋介石一面与日美勾结，一面又要做反日运动。现在武汉政府现尚未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虽然我们明知他将来必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问：我们是否应帮助武汉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其实，如果C. P. 党员来帮助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则C. P. 党员的身份必失去。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在经济上虽有问题，但在政治上是一致的。现在他们虽与帝国主义有纠纷，但此纠纷是逐渐减少的。他们怕工人阶级比怕帝国主义厉害得多。他们不惜如何与帝国主义妥协来压迫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在利用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来揭破他们的阴谋，来达到反资产阶级的目的。我们须知道，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

才能打倒。

民族解放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此重担仍是无产阶级担负。“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仍要存在，这些口号也是用来反资产阶级的。

过去党的策略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比如说，中央不要工人运动有过分的要求，而要为反帝国主义来牺牲，并要与国民党组织强迫仲裁来制止罢工。对农民运动的策略也可说是变节的，在湖南的运动的指导可说是改良的。

现在又说关于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国民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是：他是多阶级的联合。蒋介石四月以前的国民党的指导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指导，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都赶出去。此任务在国民党下层的同志都实现了，但中央的策略却不能巩固此任务，将我们独立的政策及批评国民党的权限取消。比如联席会议中的决议说：联席会议的决议不能以联席会议名义公布，只能经过国民党公布。又如说：民族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并且还有教我们在报馆中的同志不要根据我们的主义来作文章的事实。甚而至于工农运动也要让国民党来做。这是非常错误的方法。在联合战线中，我们应有独立存在及坚决的批评的自由。中央的主张恰与此相反。湖南则不同，他能用联席会议的名义公布决议案。列宁说：如果在联合战线中不能独立的存在，不能有批评的自由，则等于出卖阶级的利益。过去我们仅依靠与国民党几个上层的领袖的联合，这实是一很好的方法，但是一个取消本党甚至国民党的好法子。

在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些同志说：要与国民党联合，必不能很自由的革命。好了，现在南昌独立了，我们可以独立的、自由的革命了。这个结论也是同样错误的。主张退出国民党的，有俄国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中的谭平山也要组织第三党来消灭国民

党和共产党。所谓第三党即是少数党。甚而独秀同志也说：如要留在国民党，则不能有充分的表示；要有充分的表示，则必退出国民党。这些都是非常不对的，至少现时不对。

南昌这次政策是对的。我们的政策不要依靠到几个国民党的领袖上，而要依靠到国民党的群众上面。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现既有一新的联合，我们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要坚决的批评。只有照革命的路线，不怕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然后才能巩固革命。

再讲一讲中国党中央对国际的关系和错误的责任问题。有些同志说，这些错误国际方面应当负责任的。关于这方面，我们要问一问，国际有无一指令与现在的方向不同的。无论关于那一方面，我都可以坚决的声明：国际无一天不打算将中国党的路线引上正轨的。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中央未将国际的指导达到群众中去，比如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主要决议案尚未译出，许多中央委员都还不知道。即第七次大会的决议都未传达到群众中去讨论。中央委员即知道了也只不过仅是口头上的承认，甚至不接受。所以国际要唤起其所有的各国支部及中国全体党员来批评此错误。国际有时自然也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相信他有许多争斗的经验，我们应诚意接受他的指令，不然必遭失败。过去在西欧有的党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国际有许多的经验，我们应当相信，接受他的指导，不然我们将会走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

至于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经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比如对工农下层领袖的说话以为不足听，所以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因此党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



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得正确。

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党的问题要使群众知道。现在一定有人以为他自己是在党之上的，或者他要非难我们今天选出的临时政治局。我们对此应用党的纪律去与之实行坚决的斗争，然后党的指导才能巩固起来。至于其他问题，因时间关系不能多说。

## 李维汉关于 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国际代表的报告已完，他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1. 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2. 工人问题。3. 农民问题。4. 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5. 对国际的关系问题。此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但要简单。

## 毛泽东关于 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甚可怪的，

唐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sup>①</sup>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sup>②</sup>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

① 即孙中山。

② 即蒋介石、唐生智。

## 邓中夏关于 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国际代表起草的信和今日的报告完全是对的。过去也有许多同志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在〔去〕看更见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自今日始，已由〔早〕有由来。为什么现在才表现出来呢？这是因为阶级斗争加剧的关系。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大家在理论上亦颇认识，但在实行上却大不同了，误解了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理论。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中有两点：1. 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2. 土地革命。使同志发生问题，大家对这两点未认清。以前我们将小资产阶级看得太低，第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样还说什么土地革命呢？中央对国际决议并未了解，以致将小资产阶级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我们的党自从成立一直到现在，可说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其中还夹着有些封建关系和政客概念。每对一问题总是喜欢用手腕，利用某来打某，并非由于阶级出发点来决定一切问题。同时我们党的书生气慨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了，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荷波<sup>①</sup>是个工人，他虽现已近乎知识分子化了，但他仍未脱

<sup>①</sup> 即王荷波。

离工人的意识。他曾对我说了好几次：他以为现在用不着这样看重小资产阶级，只要我们有力量，小资产阶级自然要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过去失掉了好多机会，所以我对国际代表的报告是完全同意的。

## 蔡和森关于 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直到现在，此错误我们实不能宽恕。现在已经很显然的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不能仍然说国际也有错误，应由政治局负担，不然便是文饰自己的错误。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1. 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中央不实行而且相反。2. 五次大会以前的失败完全由于退守，南京如此，广东亦如此，五次大会即指明此点，但大会后仍照此方针。第一个决议即是要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所以完全受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反对一切“过火”的运动。当时政治局以为小资产阶级动摇，我们孤立了，实则农民已跟我们来，我们何尝孤立？小资产阶级是全体的动摇吗？还是几个上层的领袖呢？政治局没有看清楚，所以当时政局的呼声便是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3. 素来党的指导即未建筑在群众方面，以致中央完全成了普通的政治团体，非阶级的指导。直到以后，政治局的指导简直与国民党一样，并且还以小资产阶级几个上层领袖的意识为转移。这当然不是国际的错误。我们应承认过去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过去的错误。自国际训令来，党的上层有一个恐慌，以为这样旧的指导人必完全去掉，必有组织上的恐慌，这并不是群众的忧虑而是上层的忧虑，我以为这是不足恐慌

的。因为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要有政治的路线，组织上则不成问题，我们应将此点向群众解释。最后，我说的是：过去的党的错误未达到群众中去，这次的错误要传达到群众中去，使群众都认识此错误，然后党才能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权。



## 罗亦农关于 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中央对于各种运动无一坚定的策略。我时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意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第五次大会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大会时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得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需要有不郎基主义<sup>①</sup>的精神，在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来工作。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sup>②</sup>、罗易<sup>③</sup>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

<sup>①</sup> 不郎基主义，即布朗基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冒险主义思想，以法国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为代表，故名。

<sup>②</sup> 魏金斯基（一八九三——一九五三），苏联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一九二〇年春来中国了解情况，并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代表第二次来中国。

<sup>③</sup> 罗易，曾是印度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过中国。

任的。听说这次国际代表很有革命的经验，我们自然满意，并希望国际代表能将此点转告国际。此外我还有一点意见，在告同志书中应加一点：指出过去党是不能争斗的，这是在组织上的错误。还有一问题，即是党的指导的问题。五次大会时还是一些元老来指导，这是大错的。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来作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领导，这是很对的。

## 任弼时关于 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

接受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

一、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第一问题是北伐问题，国际代表罗易主张深入，鲍罗庭<sup>①</sup>主张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武汉政府的封建势力为要扩张其势力是需要北伐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北伐，但要借此机会来抓住群众。结果不然，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北伐结果，唐等势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

二、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告说 C.P. 与 C.Y. 意见冲突，主要的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

三、党怕群众。如对学生代表大会不召集是因为孙科反对。

---

<sup>①</sup> 鲍罗庭(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三年十月来华，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政变后回国。

劳动大会如此，工纠之解散也是如此。因此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四、关于组织问题。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sup>①</sup>。

---

<sup>①</sup> 老头子指陈独秀，莫即苏联莫斯科。

##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结论

大家都同意，结论自无甚说的。亦、和<sup>②</sup>说：鲍罗庭，罗易，魏金斯基之错误，鲍的理论自然是错的，土地革命不是能在学校中可以训练得出来的。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不管罗魏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至于指导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新政治局提出正式七人，候补五人。

至目前状况的估计：现在又是一种情形：农工都遭了摧残，反动势力高涨，革命遭了一严重的打击和损失，但革命并未停止。现在仍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但由民权革命的发展中而发展的阶级冲突仍未消灭。

民族革命中有五矛盾：1.上面说过我们仍要反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此第一矛盾仍然存在；2.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土地革命便是解决此矛盾之最好的方法；3.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之改良仍未实行，因此，必然要号召工人反对资产阶

---

<sup>②</sup> 亦、和即罗亦农，蔡和森。

级；4. 工农城市贫民必然起来反抗一切压迫夺取政权；5. 统一中国现在不但未做到，而且更加分裂了。所有德谟克拉西的五个任务我们未实现一个。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浪潮何时爆发？反动势力能维持到何时？这只有在革命中才可看出。现在我们的党应尽力号召坚决的斗争。我们先要有一正确的策略然后才能作此争斗。如还有人主张第三党，我们要很坚决的处以党的纪律。

最后关于告同志书提议在原则上付一表决，文字上则可推出三人组织一小委员会去修改。

## 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的报告

在未报告之先我要说两点：1. 在中国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是否与封建阶级斗争？我们要知道此是一重要问题。蒋介石等拿着政权不但得帝国主义帮助，还得封建阶级的帮助。可见中国资产阶级是与封建阶级无大冲突的。说明了此点，可以去掉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此幻想可以容许我们党外合作，实则此幻想是错误的。中国资产阶级一点民权性也没有。现在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两条路。2. 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我们的党缺乏平民的精神。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曾有同国民党提出条件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过去当我们能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又不允许我们包办，现在想包办又不可能了。过去我们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过去也是有效的，但现在已经不适宜了。七月十三日我党的宣言<sup>①</sup>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中央政治局与国民党反脸的宣言的内容是很坚决的。汪<sup>②</sup>之反脸，其主因不是 Roy 给电报他看，Roy 给电报与汪看自然是错误的，给了汪以反脸的口实。在汪接到冯不反蒋的电报时非常震怒，于是他更加方宣传反蒋。唐等于是以反共挟之，在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汪表示被人强奸，并表

① 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② 即汪精卫。

示不能在武汉立足。恰好，此时得到了 Roy 给他的电报，得到了新的出路，于是将此电报来作为他反脸投降唐等的工具，于是公然主张反共。此后，汪的主要敌人便是张发奎部下的共产分子了。张此时亦有点动摇，曾有叶<sup>①</sup>暂时退出 C.P. 的要求，我们党内当时也有人有此感觉，但结果并未成为事实。同时孙邓宣言<sup>②</sup>之发出，所以我们党的宣言比较坚决。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无意识的走到新的方针。七月十五以前，我们参加政府，还有由上面来帮助发展下层工作的条件，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

叶贺<sup>③</sup>发动之后，张<sup>④</sup>非常慌张和震怒，于是马上带了几百卫队坐火车去阻挡自己的部队。他自以为是为党工作，所有的旧部仍应归其指挥。结果自己身边的一枝枪都被缴去，这也许是客气了一点。张第二次的讨伐命令是非常软弱的，是相机发展。由此可知张已无进攻之能力。朱培德的力量亦很薄弱，两师皆不能作战。今日报载我们已离开南昌，据我推测这一定是前方胜利了。从前中央曾有一命令去前委，大概他们已照此命令进行。现在我们主要的敌军是三十五、三十六两军，但唐决不肯用此力量来为张出力而要用来夺取江苏的。第三派势力在此次事变前已有酝酿，由白崇禧、李宗宗〔仁〕担保南京和平，朱培德担保武汉，以汪为领袖，并由白李要蒋下野。第三派与唐有冲突，但现不会

---

① 即叶挺。

② 孙，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邓即邓演达。宋庆龄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邓演达在此之前发表了《辞职宣言》。他们在声明和宣言中都反对汪精卫等人的反共政策，提出辞去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职务。

③ 即叶挺、贺龙。

④ 即张发奎。



马上爆〔暴〕露，因尚要共同反共产军。

将来的局面与以前不同，以前有大的领袖，如奉张，宁蒋，吴佩孚等，以后则分为许多小军阀，进到很乱〔紊〕的时期。这证明封建阶级之倒台，资产阶级之软弱。这一堆反革命的冲突非常利〔厉〕害的，这是革命前途之一优点，因为他们内部极不稳定。

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叶挺已如此，在相当时期，北方之张兆丰<sup>①</sup>也应如此。这是一定有胜利的机会的。

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1. 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汪。列宁过去也非常注意打消〔击〕这种人。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策略。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2. 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3. 现在的目的，并不是与政府绝缘，我们对政府有三个阶段：a. 不参加政府；b. 参加政府，但发生许多错误，失掉了参加政府的作用；c. 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乡村中要农会政权。我们要坚决的干，我们要告诉群众，武汉南京北京政府都是反革命的。打倒汪精卫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

因各种要求，常委及国际代表起草了三种决议，提出今天讨

---

<sup>①</sup> 共产党员，时在西北军工作。

论。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问题：1. 如何做国民党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我们已发表了一个告国民党同志书，此书应为左派政纲。2. 军队中及兵士中工作，现在也很重要，我已与一飞<sup>①</sup> 商议要作此工作，临时政治局应注意此工作。3. 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纲要追认。

---

<sup>①</sup> 即 E—飞。

## 毛泽东关于 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

1. 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

2. 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

3. 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

4. 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

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非有一个工农德谟克拉西的政权是无法解决的。此决议的目的是最近要叫起农村的扰乱暴动。我以为条文可仍照旧，谁是大小中地主，是无法确定的，且带地方性。此问题应由农协自己来决定，一切权力属于农协。我们要使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立，如开始即要没收一切土地，则必使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来反对我们。我们的口号一出去，马上即会引起小地主的动摇，要紧的是我们不要怕干下去甚或惊慌起来，因此，不必争论，至于东<sup>①</sup>提出的会党问题，我们不但不利用，并且还应确定其经济地位。

---

<sup>①</sup> 即毛泽东。

# 第三部分

## 八七会议前后的中共 中央有关文件

---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

一年以前，国民党的政权还不过在广东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广东省内还有许多区域，和中国其他各地一样，都在反动军阀的掌握之中。——这些反动军阀，继续不断的自相攻战，极其残酷的压迫平民，将我们中国零星分割而出卖于外国帝国主义，维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几万万民众永久的处于奴隶地位，永久的穷困饥饿。然而从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造成了广东的革命基础，从广东向北发展，得着全国各地革命平民的响应，居然将许多巨大的军阀逐一的打倒，——这些大军阀的武装力量，其实比国民革命军要厉害得多呢。吴佩孚的势力被歼灭于两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被打败，最近张作霖又在河南败绩。中国之大部分，已经脱离旧时军阀的统治，民众应当可以自由的组织起

来，以求自己及中国之最后解放。革命运动的力量，已经有伟大的表演，甚至于列强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向群众的猛进让步；例如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竟不能不交还中国，并且始终不敢公开的实行其久已准备的武装干涉。这种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军阀帝国主义不能不对于革命民众的进攻而退却呢？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之伟大领袖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明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慑失措的伟大力量。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压迫，已经几十百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独立的道路，眼见得可以得着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中国的农民，本是几百千年受豪绅地主的压迫；中国的工人，本是在囚徒牛马似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贫苦市民、手工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异常的贫困，日趋于破产；——他们这些极大多数的中国平民，在这一时期之中都奋起斗争，力求自己的解放。民众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进，捶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之锁链，而锻炼解放中国的武器，以力争极大多数人民之民权，以解除中国之束缚，以消灭中国经济发展之障碍。

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胜利，中国劳动民众固然警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而别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敌，也就觉察得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他们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种。外国帝国主义者派遣军舰军队到中国，驱使他们的爪牙北方军阀作战，并且挑拨离间国民革命军的长官。以前军阀是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后来看见不能够反对革

命的伟大旗帜，于是假意归顺革命，戴起国民党的假面具，想在国民党内部来从事破坏革命。至于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尽方法压迫工农运动，或是公开的用武力来摧残，或是秘密的用挑拨离间、造谣诬告的手段来破坏。资产阶级呢，他以前是和群众运动同路的，随后看见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吓退了，于是宁可跑到革命的敌人方面去，只要能够镇压工农运动。——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心甘情愿的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婢膝奴颜的求他们谅解，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

再则，国民革命军中本来有许多长官，冒着国民党的招牌而自己扩充武力，搜括金钱；到后来，他们看见民众的胜利将近实现，各种各式的军阀制度都要完全灭亡，——就公开的背叛革命，同着资产阶级共同积聚力量，以攫取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压迫工农，而与人民的仇敌妥协。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叛变，便是这种阴谋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北伐的胜利解放了中部中国，民众运动积极的自动的发展，表现伟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击军事独裁的暴力。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间，便公开的叛离国民政府，夺取东南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杀工农，而把持国民党于自己掌握之中。

这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

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对于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持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时国民党指导机关的革命性还没有用尽，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也还有些前进的勇气。今年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足以表示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还能够依据于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以抵抗反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使它易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而

与封建资产阶级及反动潮流相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以分负武汉国民党在此艰巨时期的重任。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许多议决案，形成我们联盟的政纲。这些决议是：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赞助工农经济状况之改善而设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而实行之；坚决的赞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

所以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足以悉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愿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进展。

国民党既然有这种决心，共产党自然更加要与国民党巩固的联合，而为双方共同的任务奋斗。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政府，同时当然认定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将要很诚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责任，当能和本党党员之参加政府者共同努力于革命斗争之进展。

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

正因为人民相信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反抗封建余孽、列强侵略的工农运动，乃有如此迅速和广大的规模。两湖农民有好几百万都奋起斗争，反抗封建阶级的统治，反对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及军阀，要求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之实现，要求平民政权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起来推翻残酷的牛马似的劳动条件。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



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础。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它与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

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当然更不说实行了。而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更遇到许多阻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照理应当注意中国平民之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手工工人的呼声，但是它却不是如此，它专听豪绅地主出身的反动军官，——这些反动的军官是时时反对农民运动的。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实行社会改良以扫除城乡封建关系之根株，而与〔予〕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更使动摇犹豫的分子转移于反动派方面去，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反动军官利用这些犹豫动摇的政策，而公开的反攻民众运动。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蒋介石走狗的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现在早已到了国民党中央应当选择正道的最后时机：究竟是同着革命前进还是同着反动后退！直到最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对于湖南的反革命政变，没有任何的处置；国民政府反而默认这些政变而加以掩护，与〔予〕以合法的根据，使反动派得以完全摧残工农运动。湖北夏

斗寅的反动势力并未歼灭，其实很有充足的军力足以办到。而湖北各县的反动派，却摧灭了许多的农民协会。国民政府不但绝无肃清反动的办法，反而事实上帮助反动派的进攻，——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组工农团体，这些工农团体的罪状，就是努力牺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

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渐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可使宰割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及其他军阀的旧统治，仍旧一变而为瓜分中国的蒋介石、冯玉祥、许克祥等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中国仍将继续受着残酷的剥削，革命将受普遍的摧残，民众将更受无限痛苦，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将要高奏凯旋，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加可以稳定。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它，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的〔及〕资产阶级完全攫政〔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他们这种阴谋和暴行，是使革命破产，实在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是抛弃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决不能推翻的。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中国共产党更将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的严格确定，改良劳动条件，救济失业工人，保护女工童工，力争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装自卫。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改良雇农之待遇增加其工资，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建立乡村自治，限制高利盘剥，设立农民合作

社，要求国家以充分的经济辅助农业，并实行拨款借贷于农民。

中国共产党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或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交通，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反对买办高利盘剥者之剥削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更将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要求兵饷按时发给，反对克扣兵饷，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反对新旧军阀牺牲兵士的生命而从事于争权夺利的私战，主张兵士退伍后应由国家发给土地或与〔予〕以工作，使得从事于和平的生产事业。对于归入革命营垒的所谓土匪游民亦应当如此。

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如果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真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及反动派的阴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必以全力赞助这种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民族解放、民权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赞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遗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

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〇一期）

#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

## ——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

(一)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这一革命在中国目前已经受了一个挫折。其原因：(1)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主观上的组织力尚不能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联盟；(2)工农武装没有建设；(3)我们党动摇不定政策的错误；(4)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一新的历史的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进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的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惊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略上的答复。

(二)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嘘的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穷苦农民身上。在北方，苛捐苛税的繁重已经迫使大多数的农民抛弃土地，得不着生活。南方各省，农民的痛苦与北方无异，屡经奋斗所得的些许自由，又重新完全被剥削〔夺〕。无论南北大多

数遭受过度的压迫的穷苦农民（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失业农民以及大部分自耕农）他们已经觉悟起来，到处和他们的敌人奋斗，尤其在南方自李济深、唐生智之屠杀以来，农民之反抗奋斗，更加英勇而坚决，同时新旧军阀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内部矛盾，不仅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反而一个一个很迅速的正在继续崩溃下去。因此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目前的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应。我们的党只有坚决的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怎样开发土地革命的潮流呢？只有敏捷的认清客观情势，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广大的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才能达到此目的。此时，“不缴苛捐杂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共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实现革命民权”，“实现乡村农会政权”，“民选县政府”，“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武装”，“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抗税之自由”等口号，应当是开发土地革命的总的动力。

（三）在北方各省如直鲁晋豫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多数，他们苦于繁重的税捐日益破产，流为土匪或逃亡他省。在这里我们要以自耕〔农〕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联合一切农村穷苦民众及小地主结成斗争的联盟，反抗一切苛捐苛税，及预征钱粮，反抗一切战时的征发，实行减租“二五”，同时从这种斗争的发展进行夺取乡村政权，夺取武装以至于没取〔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等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及地〔佃〕户。

在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则佃农占多数，次之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受地主重租的剥削，同时自耕农小地主则受军阀税捐的

剥削极为繁重。我们应立即于实行“二五”减租，反抗苛捐苛税预征钱粮的口号之下实行罢租罢税，一面借以揭破武汉南京政府减租减税的伪善面具，一面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团结一切农村穷苦民众以至于小地主，进行严重的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乡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现在应用全力宣传聚集农民群众力量而实现之的口号。

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对超过年利百分之二十的高利贷的斗争应彻底进行，因为这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共同要求。

(四)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斗争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斗争，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其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

所谓政权的斗争，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耕地的或失业的)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这是乡村政权的一个正确的形式，要开始在各地实现起来。

(五)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应当指出在农民协会组织上要特别注意的几点：

(1)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



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

(2) 农民协会既团结了一般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并且在一定条件之下，小地主也包括在内，则农协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小地主一般的不吸取在领导机关内，此外在区分执委内，佃农自耕贫农失业农民至少各占五分之一，在区执委内小学教师的当选是有必要的。

(3) 各级农协设立妇女部及青年部，乡村儿童运动及儿童团体完全受农协青年部之指挥，农妇概加入农协不另组织女界团体。

(六) 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但是现在所谓革命军实际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到处屠杀农民，武装冲突已成为农民运动中极普遍的现象，因此在现时阶段中农民运动确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谋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今指出几项大要的办法如左：

(1) 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2) 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的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

(3) 对团防局保卫团等地主阶级的武装在不能即刻夺取其武装时亦采用上项的办法。

(4) 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 以合法的名义存

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5)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了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对敌者(在没有被他们的反动领袖拍卖以前)，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是异常之恶劣的，他们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的领导走上革命正轨为一定的目标而奋斗，而以“打家劫舍”为惯常生活，其行动与思想完全随其领袖为转移，因此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面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其方法与上项大体相同。

(七)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的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方〕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无〕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责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

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志忽视党的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感觉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概。党在平时既不能尽其组织上积极的责任,□时,自然更不能希望其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如果本党的领导能正确的在农民中建立起来,那末,第一,要使党的支部能够深入到乡农协,并□□正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第二,党对农民的指导必须经过党团(改正过去□□领袖的错误),党团要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第三,各省党部的农民都要□的建立起来,对一省的农民运动每次定出一月或两月的计划,督促并□各级党部切实执行。

安 中 原<sup>①</sup>  
宗 容 明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① 安中原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宗容明是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 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领导机关，因为湖南农民运动，实际表现国民革命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而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摧毁，于是发生恐慌与摇动，又因为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封锁武汉，唐生智军队的反动与二六军右倾，及冯玉祥的公开背叛武汉，于是完全屈服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军阀豪绅地主等。国民党的政策，始而动摇，对于许克祥不加惩罚，对于夏斗寅不加扑灭，既〔继〕而嘉奖许克祥及夏斗寅所领导之豪绅土匪屠杀工农摧残党部及人民团体，并且政府自己亦下令解散党部及人民团体。最近受反动军队之要挟，国民党中央居然于七月十五日开常务委员会（C. P. 未到）决定：（1）一月内召集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 C. P. 问题；（2）在未开会以前对于有违反国民党主义及政策，加以严厉处罚；（3）派代表到莫京<sup>①</sup> 商议合作办法；（4）对于工农团体及共产党员之自由，用训令加以保护。但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宁愿做军阀的秘书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汪精卫派之虚伪主义现已完全揭破。汪将国际向他提议国民党应组织两万 C. P.，三〔五〕万工农分子军队之电报做一种煽动分家之材料及投降蒋介石、唐生智之掩饰。国民政〔府〕一面下令保护工农及

<sup>①</sup> 指苏联莫斯科。

C. P.，但反动军队一面摧残党部民众。中央对于此已发表宣言，攻击武汉政府之反动，声明共产党参加政权之条件已消灭，命令谭苏<sup>①</sup>退出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与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奋斗。谭苏二同志已示威的退出国民政府。民众对此更形愤怒，即将国际电报公布在中央日报上每日登载。我们已发表对此电报之答复。孙夫人发表宣言不满于现中央之政策而避住上海，邓演达因不满汪等亦早已离汉他去，左派下层领袖除一部分受买外，现拟择一地点集会以求团结左派在党内反抗反动的与虚伪的领袖。中央对于现时武汉反动之策略如下：

1. 认〔为〕武汉中央政府已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故我们应攻击其反动行为，披露其虚伪，不可再事拥护其罪恶。对国民政府固然不应再说拥护，对汪精卫亦须历数其改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之罪恶。

2. 与国民政府合作之条件基础既已消灭，当然应立即召回国府内之党员。惟仍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者即国民党员，所以我们与其他革命分子是真正党员，汪精卫等已不是真正信徒。我们要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

3. 我们现在要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

4. 要根据答复“容共政策经过”之一文，宣传汪精卫等借该电报以文饰其反动。

5. 要根据现武汉中央之虚伪欺骗政策，指出武汉政府一方面颁布保护工农及“二五”减租，一方面任由军人摧残屠杀工农，占据捣毁工会农会。在两湖，应积极领导工农要求工农会的自

<sup>①</sup> 即谭平山，苏兆征，当时他们分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

由，立即惩办摧残工农占领工农会的武人，如此以揭破武汉政府之假面具而使工农认识其真面目。当政府不能接受民众要求时，总罢工与抗税是必要的。

6. 要积极领导两湖工人，反抗资本家之进攻及毁约，并应要求增加工资补偿因票价低落及物价增高之损失。武汉的失业工人在十万以上，我们要领导他们向政府要求工作及救济，并向资本家要求失业救济金，如此我们一方面能使他们成为反抗反动政府的一支有力军队，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成工会的拥护以反抗反动派之分裂工会政策。

7. 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向土豪劣绅反攻，残忍地推翻其乡村政权而建立农会政权。

8. 领导城市贫苦居民做要求平低物价，纸票兑现，收回国库券之运动。

9. 我党要准备全国秘密工作，办法另详组织部通告。

安 中 原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 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sup>①</sup>

国民党革命同志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你们这封信，是在国民党最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革命同志领袖对于革命的主义政策实行叛变，居然压迫工农运动与共产党分裂，这种叛变可以使国民党变成反动派工具，和反革命军人的傀儡。四个月以前国民党的中央指导机关，还有勇气力量和蒋介石破裂，不使其反动的军事独裁得以摧残党权，那时，国民党中央还想和革命的工农共同前进。现在呢，背叛国民党的领袖，已经对于摧残工农运动，压迫共产党，投降封建势力，取消民众革命胜利等类行动，公开的颂扬和赞助了。

武汉政府本来是反对蒋介石之反动的革命斗争的中心，如今却是在反动军人及其政治领袖的淫威之下，变成军阀政府；中国之内，这种军阀结合的地域本有许多，现在的武汉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武汉政府现和蒋介石等类革命之公敌，实际上毫无差异，每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首先便是工农兵士以及一般忠实党员，凡愿努力继续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伟大的奋斗事业，立志为国家民族谋解放而牺牲的战士，都应当详细的明白：几千几万的

---

<sup>①</sup> 原文无时间，是编者根据八七会议文件《小引》加的。

中国同胞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之中，英勇的牺牲了，他们誓死而争斗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却发生如此现象？为什么领袖之中发生叛变的行动？以后革命的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新任务是什么？

现在的领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政策，实行怪异的篡改，却想借口于六月间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秘密文件，来解释他们自己篡改孙中山先生政策的理由。但是谁亦不能欺骗的，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可以知道这是企图懦怯无耻的巧自文饰，国民党指导机关对于国民党主义政策之叛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很远的，决不是单单因为那所谓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国民党现时领袖之叛变，实际是因为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斗争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和四个月前蒋介石之背叛革命是一样的；如今武汉的领袖实际上是投降了蒋介石！

国民党现时领袖的叛变，断非是偶然的和出人意外的事变。这种叛变实在反映中国革命中间有许多种资产阶级成分的骑墙派，而实际上究竟是反动的态度——这些资产阶级经过买办阶级而与帝国主义连络，经过地产制度而与封建势力勾结，经过军官领袖而与军阀制度相勾连。因为他们剥削工农，所以必须反对工农运动。因此种种，他们不能执行真正的民众革命。此等社会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伪国民党领袖，和民众是相隔离的。所以只想用民众运动以满足国内几部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使各种劳动阶级仍旧处于无权利穷困不堪的地位。他们只想利用群众做自己的工具，想踏着革命的民众兵士和党员的尸骨，去造成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不愿意劳动民众得有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民



权，他们宁可重新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和封建豪绅结合，只要能镇压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之争斗，而使之俯首帖耳的服从自己。他们甚至于已经不能够继续单纯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要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非有广大的群众不可，而他们——例如蒋介石、唐生智，宁可去请日本顾问，却不肯依工农运动的力量，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情形，就足以解释国民党领袖以前动摇犹豫及现在决然叛变。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国民运动中封建资产阶级派第一次攫取国民党党权的尝试，那时伪左派的领袖就不能组织革命分子及一切力量以抗御此种反动，却任令反动势力笼罩广东，这种左派遁逃国外，不战而走。其意若曰：“民众自己将会对付新军阀，我辈但须坐待成功，归来即可高居领袖地位。”三月二十日之后八个月到今年一月间，蒋介石又想用迁都南昌的手段实行政变，那时的伪左派领袖又不能立刻勇敢地决定号召民众起来和他奋斗，他们动摇犹豫迟徊不决者整整的两个月，蒋介石却正好利用这两个月的工夫，组织团结反动的势力，一直弄到屠杀上海工人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伪左派的领袖，不肯决然的根据工农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蒋介石奋斗，他们是在研究军事投机的方法，直到看见可以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等新军阀的偶然结合之势力，方才与蒋介石破裂，同时这种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的计划对于伪左派是可以预藏着一种反对工农民众的武器以备工农民众真正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积极奋斗之时，他们可以有恃而无恐，可以转过来便压迫民众。因汪精卫等之动摇犹疑，而蒋介石得以镇压东南各省的工农运动，与李济深等相勾结，以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汪精卫等类的伪左派领袖到现在已经暴露自己的正〔真〕面目了，然他们时常以空口应承，说要民众，说为民众而奋斗以及其他种种革命的空谈，巧自文饰，以掩藏其骑墙政策及其与蒋介石奋斗之不彻

底。今年三月间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面上的决议案是很革命的，但是伪左派的革命领袖不肯实行这些决议案，明明规定要实行土地改革、劳动立法、平民自治等等，然而等到群众真正起来跟着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来的口号而勇敢奋斗的时候，这些所谓左派领袖却不仅不肯起来为民众运动之领袖连同自己所有的政治法律的权力，以助工农运动，铲除封建余孽，反而仇视并破坏这些民众运动。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实行土地革命，等到湖南被压迫的农民与封建势力决死抗争之时，伪左派领袖便动辄以“过火”咒骂农民运动，说农民协会尽属流氓土匪，不但不协助农民之艰苦的争斗，并且奖励反动军官压迫农民。城市中工人店员斗争，也遇到他们的仇视。他们不但不惩罚阴谋破坏金融经济实行反革命的买办奸商以及蒋介石的好细，反而在工人店员努力赞助革命而与这些反动买办奋斗的时候，迭次的对于工友店员施以抑制，放纵反革命的买办豪绅。劳动法的命运，也和乡村自治条例及土地法令一样，始终不得公布；即许有所谓保护工农的命令，也始终不能见诸实行。任令贪官污吏军事长官摧残民众，买办奸商进攻工人。总之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虽有许多革命的决议案，而事实上国民党领袖并未施行分毫政治法律的权力而解决工农小商人的痛苦，一面反而只以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的权力压迫工农。当这个时候，有些所谓左派领袖如顾孟余等，已经和反动的领袖(刘佐龙)阴谋举行反革命的暴乱，准备驱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密藏军火于汉口日租界并在军官中实行反革命的宣传。后来，杨森叛乱，于学忠等扰乱湖北的西北境，夏斗寅进逼武昌城，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阴谋推翻国民政府，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国民党革命同志出江西——此等反革命举动，陆续继起，不可胜数，而国民党中央不但不征调一切力量以裁制反革命军人，却迭发反对工农

运动的训令、命令、宣言、文告以助长新军阀的反动，文饰他们的反革命。这种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七月中旬。实际上这些伪左派领袖，放任夏斗寅的叛军，使能巩固其势力而摧残十余县的工农团体，他们承认朱培德“停止”江西的工农运动，他们自己默许许克祥的长沙政变，便能畅心如意的屠杀湖南人民，摧残工农运动，他们自己下令解散湖北好多县的农民协会。这些伪左派领袖不但不要民众，并且不要一切革命党部及党员，不论其为共产党与否。反动军人当然不但反对工农，并且反对民权主义的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江西各县党部曾被迫而停止工作，湖南省党部县党部都被解散。国民党中央对于这种事件，不但不反对，而且自己也帮着实行（如解散黄冈等县党部），这些领袖既摧残工农，又摧残自己的党部及党员群众岂非背叛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六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徐州会议的时候，冯玉祥公开的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等到这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必须决定选择一条道路！或者同着革命的民众前进，或者同着反革命的军人反动。这时候，冯玉祥对国民政府提出反动要求，唐生智赴湘后，亦来两电，要求“改组”工农运动，实际上便是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并且要求排斥共产党（如何键对于军队的排共令）。

这些领袖，在群众运动有力量时候，放纵反动军人去压迫他，到了群众运动已受历次的摧残削弱之后，当然更加要站到反动军人方面去，因此，这些国民党的领袖，完全接受反动军人之排斥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等新要求。

这些情形本是最近六月底至七月半武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篡改国民党的革命政策的真相，而决非借口于所谓共产党的秘密决议案所能掩饰的。最近国民党领袖在冯玉祥、唐生智系的反动军官淫威之下，最后的决定压迫工农运动，本此目的而与共产党破裂。现在他们要掩饰这种反动政策，反而归罪于共产党对国民

党之不忠实。然而，譬如孙科，他在五月间对美国新闻记者谈话，就说：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当国民政府的部长完全是为着容易对付工农运动起见。汪精卫等亦是如此见解。这算是对于共产党的忠实态度吗？这实在是要利用共产党做压迫工农运动的工具，共产党决不肯被人如此利用。国民党的这些领袖，都正因为共产党不肯帮助他们压迫工农运动，而宁可与共产党破裂，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工农运动政策是不肯背叛的。国民党领袖既得政权，实际上早已有了实行这种政策的可能，应当尽力进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及其他革命的口号。事实上，弄成了国民党领袖不肯自上而下进行这些政策和口号，却任令民众是孙中山先生主义之最好的实行家，比实际上背叛孙中山先生政策之领袖高明万倍。国民党领袖既有政权，他们早有实行改组军队的可能，使军队真能拥护民众利益。然而他们不但不进行这种“使军队成为民众武力”的政策，不但不遵循孙中山先生向来认为军阀并非革命可靠的同盟之遗训；反而痛骂共产党要增加工农分子于军队之中，并肃清背叛革命的军官，为一种罪恶。国民党的这些领袖们，既然不能了解这种革命的根本职任，既然不能代表国民群众的这种迫切的希望和要求，他们就不配僭称国民党的领袖。他们是篡窃权位，是镇压国民党革命意志的政客吧〔罢〕了。现在的时候，既然国民党的领袖将国民党拱手让之于反动将领专恣的掌握之中，那末要求国民党组织的民权化，使其多数党员推举革命的领袖，——实在是最近理最切要的要求。

国民党指导机关之现状是如此，国民党中央已成反动军官掌上之玩物。犹豫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变成反动的实行者，参与反动的行为。武汉领域之内，如今也和蒋介石的领域一样，工农运动都受很大的压迫。无论国民党中央发表许多虚假的欺人的空论，决不能掩盖许

多铁一般的事实，武汉已有二十五个工会被封，湖北许多县的农民协会已经捣毁，湖南的工农运动已经被摧残，江西也曾被暂时“停止”。国民党中央已经允许唐生智及其他将领任意驱逐共产党，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显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进行工农政策而实行压迫工农运动，不联合共产党而与共产党破裂，不联俄而在机关报上宣传反俄。汪精卫所领导的一切领袖也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中山先生的遗训。

即使现在为满足唐生智蒋介石的私战，对于民众这种战争丝毫都没有益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如果国民党不能脱离这种指导机关，这是国民党的亡党。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

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革命的国民党的政纲是什么呢？

(一)首先便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叛徒，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

(二)反对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一派的人——他们是甘心做反动将领的工具了。

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

(三)决然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壁垒及其一切余孽。最主要的封建壁垒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地主豪绅军阀贪官污吏重利盘剥者对于农民的剥削掠夺制度，只有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才能肃清封建制度的关系，要实行这种口号只有农民自己

起来力争土地，从豪绅手中夺回政权。

(四)消灭城市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牛马奴隶们的劳动条件。只有满足他们要求方能造成解放劳动民众的前提，要工农组织之完全自由，对于工农运动予以切实赞助。

(五)力争真正民主政权的建立，便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群众及劳动群众。推翻压迫剥削民众背叛革命之官僚军阀的政权。

(六)取消一切军阀性的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由革命的将校指挥而不用封建性的军阀。实行武装工农。

(七)无妥协的实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与苏联亲密的联盟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及工人阶级结合巩固的联合战线。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力争中国的解放与统一，反对买办阶级的影响及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

(八)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力争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及工资的增加，实行救济失业工人，要恢复一切工农组织及工会的权利——这是几年来革命运动胜利的成绩。

(九)力争一般革命群众工农团体的一切政治自由，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篡窃国民党旗帜的假国民党。

国民革命的胜利，真正民众的胜利，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都只有站在这种纯粹的遵照中山先生学说的政纲之上方有可能，只有实行这种政纲方能开辟发展革命的道路，使大多数中国人民得到利益而不仅为各种封建资产阶级中少数高等华人博取权利。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真正革命的党人，应当团结起来开始为这个政纲而奋斗。

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我们决不服从现在这种伪国民党中央之开除共产党分子的决议，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权僭称国民党的指

导机关，他们已经违背国民党的主义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遗训。

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盟，都应当团结起来，努力救党，自然不要放弃任何公开的可能，但是要准备着这些伪国民党领袖会竭力迫逐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使丧失一切自由，而处于秘密地位。所以要准备着在无论何等环境无论何等条件之下，我们大家都应当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努力为解放中国广大的劳动民众而奋斗，而牺牲，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毋使国民党竟亡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之手！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武汉政府反动后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主张》一书）

##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 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一)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议决案，决定这个行动大纲，准备在湘粤鄂赣四省实现。

(二)中国革命〔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sup>①</sup>独裁，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在这里党的政策需要新的变更，革命的社会势力需要新的聚集和训练，现时反动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因为新遭了挫折，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这次抗租抗税的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之新阶段，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新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

(三)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具体的表现便是强农民建设与小地主联盟的乡村自治，及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这个错误是由是〔于〕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来的。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

<sup>①</sup> 德谟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的音译，意即民主。



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明白了这个才能不自陷于矛盾的狭巷中，而可以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

#### (四) 暴动的战略：

(1) 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

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的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2) 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

(3) 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4) 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5) 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

(6) 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

兹将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每省具体工作抄一份于下：

鄂：湖北暴动大纲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

其他可根据大纲拟一具体的计划。

湘：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

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

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sup>①</sup>（书记泽东）。

赣：1. 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 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 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 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

粤：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力暂未达到地方即起来暴动响应，夺取乡村政权，建设农会威力，并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用以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

## 安 中 原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sup>①</sup> 即任卓宣(叶青)。

# 中央答复山西省委的信

## ——采取暴动土地革命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

声闻<sup>①</sup>兄：

报告全份已接到，在答复你报告中问题以前，先将现时政局变化略述如次：

武汉政府，国民党的领袖汪、孙、谭<sup>②</sup>等，实行背叛革命，接受了唐生智等的分共讨蒋的要求，已于七月十五日通过分共的决议；现在武汉是与南京一样的反动，屠杀工农，压迫共产党员，虽然口头上，白纸上还是保护工农，其实际则已完全白色恐怖，与中国其他各地之情形一样。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大屠杀起，到武汉七月十五日，完成了中国封建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事业。我党因为指导的错误，没有能依照国际指示，实行在两湖没收大地主土地，举行盛大之农民暴动，而反处〔处〕让步迁就那时所谓左派汪、谭等，于是一败涂地。现在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以前的错误。故定即日开紧急会议，改正以前错误，另定新的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现在时机尚未过去，两湖农民暴动尚有可能，第二方面军中如贺龙、叶挺军可分化出来，故中央已决定湘、鄂、赣、粤秋收时，即现时实行暴动，提出“没收大地主”与“农会政权”的口号。贺龙、叶挺已于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各地预

① 声闻是山西省委的代号。

② 即汪精卫、孙科、谭延闿。

备响应。武汉已于八月二日实行总罢工一日，并同时进行扰乱金融之办法，现在商人都拒用国库券，市面不活动，政府财政甚感困难。

从上面的简单情状我们应有下列各点须注意者：

1. 不可再对武汉政府或汪、谭等有幻想，我们要反对他们如对奉、蒋<sup>①</sup>一样。

2. 我们应在国民党群众中揭破汪、谭等的假面具。我们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在下层组织反抗背叛总理的领袖之革命左派。

3. 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使工农获得政权（国际第八次决议指出，中国现在是要实现工农民主独裁），农民暴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是唯一方法。

4. 完全要改正以前利用政策，而应从事于创造自己的武力。

5. 尽量发展工人的斗争的锻炼及训育其斗争能力与领导资格。

根据〈了〉以上所述现在时局下所应走的方针，对于你们的报告中各事，有以下的答复：

1. 过去山西省委犯了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如当你们晓得了阎<sup>②</sup>要反动时，你们不站在革命的前线领导群众与他奋斗。反而“马上保守起来不致给他有机可乘而给我们以打击，各种外部工作停止，注意四郊工作”，这懦却〔怯〕者的退让政策，不革命者的奋斗政策，实际上此种退让并不能避免摧残。摧残始终是要来的，而且或更甚；后来的事实证明反动不是可以避免的。进攻即使失败，亦能刺激群众，使他们认识我们是他们先锋。退让的失败，那就一败涂地。此种错误我们应当指出，使我们能于失败得到很好的教训。中央过去亦有这一样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

① 奉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即蒋介石。

② 阎即阎锡山。

有这次的大失败。但是我们不怕指出来，并且承认与改正。山西同志亦应如此做法。

2. 对于你们现在的计划，中央认为你们仍着〔然〕还是以前的机会主义政策。（一）如说：“我们目前工作计划是准备山西与阎军<sup>①</sup>冲突的局面”，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计划要能根基于发展工农的斗争上面。要尽量利用两派军阀之斗争，但不能以之为我们工作计划的基础。假使冯、阎讲和了，不冲突了，我们如何办呢？（二）对于农运的报告说：“只能秘密发展组织，没有什么争斗”，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发展民众的斗争。减租，罢租，抗税，没收大地主土地，有争斗然后有真组织，没有争斗而能组织起来是罕有的事。现在只有领导农民实行经济斗争，在争斗中可以广大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暴动是推翻山西军阀统治之唯一方法，其他都是附带的。（三）不做反阎而单做反奉，这是避免斗争。这是不对的。我们山西同志一定要提出反阎的口号，并且进行反阎运动。实行破坏他的乡村基础——土豪劣绅大地主等封建势力。以上三点，是山西工作上主要之点，而从你们报告上看出是有错误，务希根本改正为要。

3. 对于工会运动，你们特别注意正太矿工兵工厂工作，这是对的，对工〔于〕阎的工会，我们要领导工人反对与破坏，我们应保存我们工会的秘密组织（假定不能公开），但是我们亦派少数同志或革命工人加入阎的工会，做探听消息，从中破坏，吸收群众等工作，工运应有详细报告。

4. 对阎于〔国〕民党要号召党员反对，应不断地举出事实证明其与三民主义相背驰，团结革命分子，成立革命左派，领导党员群众实行反阎（须根据孙邓<sup>②</sup>及C. P. 告〈报〉同志书，宣传及工

① 指冯玉祥国民军。

② 孙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邓即邓演达。

作)。

5. 注意秘密工作，过去的教训，已经受过了，我们现在全国无论都在白色恐怖下，再不注意全部组织及工作，必致完全倒台。对于名册等事更要小心，前次遗漏〔失〕名册之同志必须给以严重之处分，庶可警戒其他同志。

6. 派指导人到山西工作，一时尚无适当人，有时再派。

7. 交通每月一次，中央拟设法做到。不然亦必每两月一次。如你们能担任派可靠同志担任最好。

8. 以后当与山西发生密切关系，勿念。再你们的报告要具体。虽屑碎亦不要紧，特别是农村的情形。切忌笼统而不实际。

9. 军事工作亦应本着独立政策，不可专赖可利用之军队。利用之则可，如认为是我们军事工作之全部则错误。我们应注意于武装工农，创造自己武力之工作。土匪工作及加入阎军内部破坏亦是极重要的工作，设法宣传兵士群众，尤为紧要。

10. 中央改名为吴世荣，交通处暂在汉口南洋大楼左侧永安里十二号，找张启发必须先住客栈，然后不带文件去找。

世 荣<sup>①</sup>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sup>①</sup> 世荣(吴世荣)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

德福<sup>①</sup>同志：

谢辉同志来汉所带各件均已接到。严同志来又接到组织、农民等报告，兹答复如下：——

(1) 谢辉走时曾带复信报告，关于此间时局。并叫他到上海领取八千元作粤经费，是否已收到，请即示知。新预算一时不能确实答复，必须国际复电来。四，五，六月粤省经费，中央账上已有叫上海拨寄数千元。此事当待中央向上海查明。救济会本有一万三千元汇上海，洽〔恰〕巧远东银行被封，又生周折。

(2) 肃委<sup>②</sup>事，因时局之大变而应注意者如次：1. 武汉政府已是反革命政府，不应再拥护。2. 武汉政府对各省党部已停发经费。对肃委当亦不发。3. 武汉政府已与李济深进行妥协。对肃委恐将认为敌人。4. 肃委中有汪、孙<sup>③</sup>诸人的走狗，须防其谋害我们及告发密谋。5. 肃委可仍继续工作，但须对汪、孙派守秘密。6. 对武汉政府可不理，进行独立的工作，旗子仍用国民党。7. 李品仙回桂事，与我们无利。况一时亦难实现。

(3) 组织报告，中央认为满意。

(4) 农民暴动的准备亦好。更须加紧。

---

① 德福是广东省委的代号。

② 肃委，即肃反委员会。

③ 汪孙，即汪精卫、孙科。

(5)其鉴、彭湃及大批同志由江西向粤办前进。绮园<sup>①</sup>由海道返港，带有中央关于农民暴动的决议。

最近中央报告如下：

(1)实行与武汉政府及汪、孙、谭等开战。此可于中央宣言等件看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无异。汪、孙等与蒋介石无异。武汉二月〔日〕实行总罢工一天，反抗政府。武昌、汉阳完全达到目的，汉口方面完全失败。因防范太严，各小街两头各站兵二人。又由车夫领袖大批被捕，以致车夫复工。此次罢工本因车夫罢工而起，其他见车夫复工故不罢。我党在汉口工人中无基础为最大原因。广东根据中央宣言宣传攻击武汉反动是汪已投降唐生智。

(2)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已解决了六军三军一部械。汪等本预备二日在九江开会，闻信回武汉，发令讨伐贺龙、叶挺，并宣布共产党为叛徒，应明正典刑。张发奎态度如何未悉，惟他亦无法。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sup>②</sup>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日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

(3)鄂赣湘粤同时举行农民大暴动。其大纲已交倚〔绮〕园带上。鄂湘已着准备。湘南粤办亦有军事动作之准备。惜力量不大耳。

(4)新国际代表已来，决定开紧急会议。此会议批评过去中央的机会主义及决定新的政策。广东太远而工作紧张，无法参加此会。想广东同志必能同意于批评过去中央对湘事及对国民党政

① 绮园，即罗绮园。

② 即朱培德。



策之摇动，因而致于失败。并且一定亦感觉到新的指导与方针之必要。议事日程如下：

1. 接受国际的最近训令
2. 通过告同志书(批评过去的错误)
3. 农民决议
4. 工运决议
5. 组织决议
6. 新的指导机关。

(5)中央暂留武汉，交通处在南洋大楼左侧永安里十二号找张启发，来人先须住店，再来找，以后再交文件。粤汉交通，至少要二人，除谢辉外请找二人来汉，由中央担负费用。中央名已改吴世荣，安中原取消。

世 荣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中央给湖南省委信

——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

湖南省委：

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对于湘省工作有以下的决议，请查照执行：

中央前次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意义是要我们党坚决的去领导四省农民革命高潮，发动土地革命的暴动推翻四省反动统治，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sup>①</sup>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至于口号上则为“民选革命政府”，“真正平民的民权政治”，故宣传上可说：“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民权政府。”而实际上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则应看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根据马也尔及你们的报告，对于南昌暴动有两个意向：一个

---

<sup>①</sup> 指国民党左派。

是南昌军事由闽转粤；一个是由湘南编军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前一个意见是要南昌军力避免斗争离开四省暴动，后一个意见是重回粤军事看轻湘省暴动，不免本末倒置。中央认为都是错误的。实际湘省如真正集全力发动本省暴动，便是给南昌暴动以根本上的有力的响应。总之，你们要明白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去决定实际工作计划。

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sup>①</sup>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别〔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

湘南工农会中，在马变<sup>②</sup>以来旧的领袖最大部分被压迫去了或被枪毙，此刻只有赶紧的坚决的提取〔拔〕在这几月斗争中表现的积极的“暴徒分子”到各工会领导机关做领袖，同时我们党便也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这些“暴徒分子”入党，以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就是会匪之富于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绍加入。必如此，党在国际指导之下新的路线方能实现，秋收暴动才能胜利，要毫不犹豫的执行。

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左派党员及其组织，曾在我们指导之下奋斗到现在，我们党更要坚决的从组织上取得这些组织，从政治上去领导他们，使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不要单靠凌炳、谢觉哉的秘密委

---

① 湖南的郴县、宜章、汝城。

②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湖南长沙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员会去领导，因这种委员会只能号召而不能实际去领导的。现在全靠我们下级党部去拿住相当的左派党部共同争斗，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尽可介绍入党。

湘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中央认为应当改组，兹决改组的办法如下：

1. 由泽东、公达负责与湘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2. 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九人不限定都在长沙。九人中至少要有三个工农分子，三个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
3. 中央指定胡[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特此通知

吴世荣(安中原改)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 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

——关于成立南方局<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

兹临时政治局决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此外，并须〔负有〕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之议决〔案〕且根据之整顿该三省党部组织之责。至于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

再，临时政治局决以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特此通知。

谭平山同志决派赴莫斯科。

吴 世 荣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sup>①</sup> 副标题是编者加的。

# 中央给山东省委 山西满洲临委的信

——组织北方局<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山东省委、山西、满洲临委：

兹政治局决定组织中央北方局，以和森、荷波、述之、〈述之〉昆弟、伯庄<sup>②</sup>为委员，以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sup>③</sup>、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北方局负有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议案及根据之整理各该省党部之责。

再，常委决定以伯庄为顺直省委书记。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原稿)

---

① 副标题是编者加的。

① 即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

② 今河北、北京、天津。

# 中央通告第一号

## ——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 讨论该会决议问题<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且以后各部通告，统由中央常委发出，特此附白)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且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各地党部务必要将这次会议的决议(告全党同志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以及组织问题的议决案)给一般党员详细讨论，使得切实的了解并切实的去实行。八七会议的意义之大要如下：

(一)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自中央以及地方)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第五次大会以前由于不能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已经做了些错误，第五次大会以后，又因为不能了解对付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而更加错误。总以为既要联合国民党，便必须要一种让步政策。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免泯灭了。其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在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中，是要领导无产阶

---

<sup>①</sup> 通告一至四号的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级〕勇猛的进攻封建势力军阀及帝国主义，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必须有这种独立的革命斗争，然后方能取得革命之领导权，然后方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及农民。固然让步退却有时是必须的，但是以前中央的政策客观上不仅是让步，却是放弃领导权——因为客观上是处处等待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独立”斗争，于是他们摇动犹豫之时，中央自己也不免摇动而犹豫了。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还有一种倾向，便是注重于领袖的接洽，——民党，军队，甚至于红枪会土匪等工作，都是如此。而对于群众的斗争，不能加以充分的领导，客观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滞。没有“平民式的”精神，而偏于上层领袖的结合联络。这种不依据群众斗争的力量方法及精神，而注目于上层领袖的政策——自然处处要迁就那些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专采用让步政策，自己认错承认幼稚等等。各省党部的政策亦多采用这条路线，最显明的例子如陕西、河南，当冯玉祥反动时极力退缩以图换得冯之中立。顺直省委迭次政治报告都主张向武汉“左派”让步，以免促其右倾，并主张有决心实行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发布对中等阶级的政纲等。

（二）客观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土地革命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剧烈的改革，彻底的铲除封建制度，这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表演〔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他已掉过枪来了反对这一革命，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买办豪绅相联系的反动成分，也决不能和这土地革命的发展同道。何况当时武汉政府及军队中尚有直接代表地主豪绅的分子。如果土地革命已经由群众剧烈的发展，则组织这些群众的力量而独立领导工农城市贫民的联盟进攻，便是当然的结论。但是，当时中央机关及指导的同志对于土地革命问题有许多歧见，结果，是一个总退却的指示。工会（店



员等)的斗争之中亦是如此。这样，客观上便是党与正在奋斗的群众脱离了。

(三)再则，以前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职任，始终没有明了的观念。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的阶级。现在农民的土地革命及农会的政权革命，既是民权革命最高形式的表演[现]，无产阶级自然应当和农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领导他们去打倒土地革命之一切障碍：新旧军阀，豪绅地主，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虚伪的“左派”。“谁不赞成土地革命及真正的民权革命(农会政权)谁便是假左派，谁便不是左派”。因此，早应有建立纯左派政府的决心，亦即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真左派的国民政府的决心。——否则永无所谓工农民权独裁制。但是事实上当时对于武汉政府的观察，确有偏重于承认他已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独裁的意思，因为当时并没有力求刷除其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分子，却在保存这一联盟政府。

因此种种，当时中央政策之客观上的理论是：缓和些阶级斗争，以保存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五次大会的政策和方针并没有实行，却是抛弃了。如今中央紧急会议接受国际的批评，必须使党员群众完全了解这种批评的意义，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指导，因此，必须将这些紧急会议的决议，极普遍的发到各支部之中，使党员群众都能够研究而实行；使党员群众的意见得以督促各级党部机关。党的政策问题，都要使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讨论，以实现真正革命意义的党内民权主义，党的群众正在努力斗争，依据他们的力量，是纠正机会主义错误最主要的方法。

各地党部接此通告及八七紧急会议议决案后，务必从速翻印传递下级党部，开始讨论，并立即遵照这些议案改正或实行党的组织，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运动之新方针，附上八七紧

急会议议案一册，项目如下：一、告全党党员书；二、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三、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四、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五、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吴世荣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一期）

# 中央通告第二号

## ——党的组织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

(一)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所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主要点有七：

一、各级党部要根据紧急会议的精神，进行党内的讨论，根据此讨论改组各级机关；

二、现时组织上主要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从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

三、支部的组织要合于秘密奋斗的需要，并且要尽可能的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

四、各级党部要多召集负责同志会议，以密切党的指导；

五、从速组织并强健各种党外团体中的党团组织，特别在秘密状态中的工农会，需要党团的组织以保障其存在和发展；

六、工会机关的指导要注意选换有经验的工农同志担任；

七、严格党的纪律，党部机关一切决定，无论任何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县委以下之机关，应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党员之忠实与否。

这一个“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再总括的说，又有两点：就是改正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和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部接到这个决议后，应当专门提出讨论，经过这一专门的讨论，定出实行计划，报告上级党部批准，省市县党部须将

实行计划和执行情形在十月十日以前报告中央组织部，不得延误。

(二)党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虽则是不自觉的，却经过至少一年以上的历史的酝酿。这种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的酝酿必然的影响到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也带有不少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之〔及〕农会指导机关的成分上表现得很明白，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工农分子向来是占绝对少数，几乎不能成比例。广东、湖南、上海、顺直、湖北，这些地方的党部有了四五年的历史和成万的党员群众，工会运动农民运动也都有较好的基础，可是一检查指导机关中工农的成分，则非常之少甚至等于零。这样如何能保障党部机关之不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呢？工农的机关，也犯着同样的毛病，例如两湖，成千万的工农会机关的领导者，最大部分是由知识分子充当。屠杀一来，尽先跑掉的多是这些分子，然而这些分子跑了之后，却有许多工农分子起来代替了他们（湖南的报告），这种经验，是值得我们深省的。党对于流氓性的工农分子或会党分子入党，每每取的怀疑或拒绝的态度，也是受了这一原因的暗示，还有其他的毛病，此地不能详叙，这种毛病，在组织上颇有了根基。

紧急会议已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改正了，但这一改正的实现，必然要有组织上同样的改正，否则政治的改正将成为抽象的白纸黑字的，因此各级党部经过“党内讨论”以改组党的机关，审查党员资格，是实现这次紧急会议所指出的政治路线的最主要的关键，各级党部应当极端忠实的去执行。

(三)自从三月三十一日四川的屠杀<sup>①</sup>，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屠

<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和近郊农民万余人举行集会，遭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等血腥屠杀，死伤千余人，即重庆“三·三一”惨案。

杀以至长沙的马夜事变<sup>①</sup>，汉口的七月三十日，我们的重要部党如上海、湖南、广东、北京、四川、武汉、南京、江西、浙江——统在新军阀的极残暴的白色恐怖之下继续奋斗。以至于今在这白色恐怖的过程中同志被牺牲者约三四千人，被监禁者至少等于此数，因为这个缘故，大部分组织被破坏，需要重新建设。经过了这样大的悲惨的牺牲，党在组织上应当得着一种可宝贵的教训，为以后改进组织的帮助，这无论如何是可能的事情。可是上述这些，党部对于中央不仅没有把这样的材料寄来，反而在当地事变以后，连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也没有。从五次大会后至今中央对于各地党员数目和组织状况一点也不知道，虽然这里也有许多困难，然终久这样下去成何事体呢？兹特相约二事：

(甲)直接于中央的各党部，无论如何，每月月底须将该党部所属组织，做一详细报告寄来，报告中包含：

一、所属各级党部机关之增减(支部则须分别性质统计)和增减变动的概况；

二、党员的数量和成分(以县市特支为单位)的统计；

三、从省委至支部，各级党部机关负责人数和成分以县市特支为单位的统计；

四、工农国民党等民众团体的数量以县市为单位的分类统计，在各类团体中党团数量上的统计及党团负责人成分之统计；

五、各种工作人员的统计(如系可以在党部机关工作的人员则须分三等统计，例如宣传人材，可以做县委市委宣传的若干，可以做区委或支部的宣传的若干)；

六、省委本身组织的状况；

七、收月费的情形；

---

<sup>①</sup> 即马日事变。

八、执行纪律的情形；

九、被牺牲或被监禁的同志的履历的报告；

十、省委对各级组织的批评的概要；

十一、下个月组织计划。

接此通告后第一次报告须尽速寄来。

(乙)江苏、广东、湖南、湖北、顺直、江西、浙江、山东、安徽、四川等省省委或临委，须指派专人在省委或临委组织部指导之下做成“白色恐怖时期中组织变动的经过和教训”及“白色恐怖时期中被难同志(死伤，在狱)的履历和统计”两个报告，至迟于十月十五以前寄来中央。

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们！盼望你们接到这个通告后，战胜一切困难，一一立即执行！

吴世荣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二期)

#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 与策略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sup>①</sup>

## (一)

中国革命，现时正在自己发展之中，经过极危急极剧烈的转变关键。这一转变关键，即是各种阶级力量剧烈的变更其结合之形势；各阶级力量之变更其结合形势，实在早已开始，而以四月十二的上海屠杀至七月十五的武汉政变为其结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革命营垒中，阶级分化，已经表演完结。民众〔族〕资产阶级开始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并已与反动的封建军阀联盟。蒋介石的四月十二屠杀以前，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营垒之中，有两个倾向并存着：一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是急进的革命主义的倾向，这两个倾向一直互斗到现在，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互相仇视而不可调和的营垒相抗衡：一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现在已经完全放到工农运动身上，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才能履行这一任务；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亦在

---

<sup>①</sup> 此件无时间，这里是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会议记录判定的。

其中——如此，方能履行这一任务。

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之间的联盟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固然日益趋于不可避免的破裂，然而并不一定要象现在这样的破裂形势。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亦是各种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可是这种胜利，只能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达到。各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如果要达到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那就必须是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然而实际上现在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胜利，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严重的失败。这一失败的责任，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指导之机会主义政策，阻碍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放任资产阶级的行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居然能吸引几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到自己方面去（尤其是知识分子及与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的一部分反动分子）。这种反动的胜利，其规模很大；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尤其是四月以后，不执行那种屈服的取消群众运动的方针，而能切切实实〔实〕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那么反动的胜利，不能如此之大的规模。现在中国革命经过极厉害的危机，其原因便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完全是错误的革命的。战胜这一危机的基本条件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之正确的革命的策略，要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努〕力解决革命斗争中每一阶段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一切任务。

## (二)

中国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许多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任务，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先变成了反动的力量。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之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不但反对封建制度的余孽，并



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而且革命已经造成一种力量，足以来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在这两年来，已经发展得非常之伟大。然而正因为这种力量之发展，便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反动的营垒之中，而革命却还没有能使中国之国际地位，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得有任何重要的变更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暂时的胜利，这种情形使中国革命之两个前途的问题变成目前紧迫的问题——已经是中国平民的一般斗争的中心问题了。

如果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国际帝国主义妥协成功（而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力求这种协定的成立），如果他竟能在全中国范围的实现与封建势力的反动联盟，如果封建资产阶级的联盟能够完全镇压工农的群众运动，最后，如果国际资本政治上经济上确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巩固起来，——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的发展就会走上长期的迁延的使几千百万工农受着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灾祸的道路，——以资本主义来排斥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如果得有巩固的胜利，并有外国的赞助，则中国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不过比较前一世纪的普鲁士更加要受阻碍，更加要多受痛苦，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实在是一切进步中之巨大阻碍。即使对于向着资本主义前途之进展，亦是极大的阻碍。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与世界帝国主义加重其对于中国之殖民地政策的剥削互相联结。

至于别一种的发展道路，则必须革命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而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制，方才得有保证。革命在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上，其客观的内容是：一、完全解放中国于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特权，

取消外债，关税自主〔自主〕，外国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交通机关收归国有等等)；二、建立全国的国外市场，——没有政治上统一中国，没有消灭军阀的割据，没有集权的中央政府，这是不可能的；三、肃清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遗毒（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土地国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坚决的推〔摧〕毁一切国家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民权的新政府，歼灭土豪乡绅官僚军阀等)；四、急剧的改良工人阶级之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坚决的取消工人之无权无利穷困不堪的现状——这是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力量之主要根源之一。

这些任务，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才能够实行。然而中国现状的特性，更在于这种自无产阶级农民来实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反抗中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为着完成民权主义的革命反〔及〕中国之民族解放，也不能不进而没收一切外国工业及一般反革命党财产，这就要超过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及农民，怕超过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怕进于社会主义式的道路，那么，就是民权革命也不能得到胜利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将以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与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并且要靠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帮助。然而这一转变始终将要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性，以及无产阶级独裁胜利之存在，就是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客观的保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认清的主要的目的。

至于这两种前途中，究竟那一种前途得以实现，那就只有斗争可以决定。为要有正确的指导起见，必须要很清楚的分析一般的客观形势的及每一时期各种力量之相对关系。

### (三)

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巩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张发奎军队之中共产党员在南昌起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就可以算得这种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先声。如果革命之重新高涨客观上的前提不具备，则南昌起义的暴动也就不可能的了。这些主要的客观前提是：

(一)中国现在任何稳定都不能有——因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政变，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本是如此，中国的革命，本来是由于这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集聚了许多的国际国内的矛盾，日益增长激烈〔励〕所致。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中任何一个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格外剧烈起来，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可见，为什么现在发展全国的大危机，这种危机的急遽，正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之后。极紧迫的经济危机(财政、商业、工业都是如此)，和政治军事的危机互相联结着(国民革命军的崩坏，军阀的分裂和互斗，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内不可避免的纠纷分裂割据的大扰乱，表面上虽然南京和武汉政府要统一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国民党也在崩坏)，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不能够继续力争中国的民族利益，不能够保障中国几家的统一，不能够解决工人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预防经济的大崩坏，资产阶级军阀自己的营垒里，土崩瓦解的倾向非常厉害。这种全国的大危机的出路，只有民权革命彻底的胜利，否则，便要使民众受着无限的痛苦，中国的政治经济经过极大的崩坏，中国因此而大大的退步，由此而准备“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

(二)工农之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受着失败,然而还〔没〕有大破坏,还没有因为受了镇压简直不能够重新高涨。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人区域中秘密工会的奋斗,就足以证明;虽然白色恐怖非常厉害,然而群众的积极〔性〕仍在日益增长。广东、湖南、湖北、陕西、河南等省,虽然有极残酷的反革命的压迫,然而农民运动的革命基础仍旧存在,革命已经引进极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的生活状况,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简直是日益恶化而没有出路。所以这种群众独立的自然暴发的斗争,不能为任何恐怖政策所完全镇压。

(三)中国的国际状况没有经过任何的变更,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以巩固,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与外国资本妥协,然而同时,他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代表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面〔两〕面政策,自然又使企图完全统治中国的外国资本离开他,使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发生困难。别方面呢?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有冲突,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联盟之内,亦有冲突,——互相争权夺利的抢地盘主义是他们的天性。这种情形,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阻碍。最后苏联及国际的革命运动,不〔乃〕是加强中国群众革命斗争的绝有力的动力。

有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后,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之组织和正确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坚定胜负<sup>①</sup>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保存了自己的战斗队伍,不怕反动的缉捕压迫,而且能够改正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凡此一切,总合起来,便使中国共产党负着极大的任务,就要在一切客观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准备组织革命的暴动,认清自己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军阀

---

① 原文如此。

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权制独裁〔制〕。

#### (四)

因为中国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没有集权的政府，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中央政府来决定暴动的胜负。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样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认真的明了并且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暴动学说，——暴动是一种艺术，不是可以耍着玩的，要极精细的在技术上组织上政治上准备好，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久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要破坏动摇我们阶级之武装力量。因此，本党应当极快的征调最大限度的力量，到新旧军阀的军队中去工作，组织并发展我们的支部。这一任务，是现时非常紧迫刻不容缓的任务，本党以前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

民众工农暴动的胜利，势必引起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残酷的反攻，从经济怠工，直到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准备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实行猛烈的革命战争。必须准备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企业工厂，采用极严厉的镇压政策，——实行革命的独裁。

## (五) 暴动之方式

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这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国民党的领袖已经被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所利用，以〔已〕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不但背叛了国民党党纲主义中的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成分，而且葬送了国民党，使他要丧失政党的资格，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能使国民党形成资产阶级的领导政党，这种政党必定要在与现时国民党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上方能发生。要恢复国民党，便只能恢复革命的国民党，或是简直不能恢复。汪精卫、唐生智的所谓党权三民主义等等，完全是冒充国民党的假招牌，以掩饰其反动的政变，——这次政变其实是国民党亡党的政变。

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本党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固然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但是在下级党部之中，党员群众的行动，是以纠正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业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

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胜利，使小资产阶级更

加动摇分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他们的群众政治上是崩坏了，无所适从了，中有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本党现在和他们合作而组织秘密的革命的国民党。但是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用〕。同时共产党应当极谨慎的避免过去指导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保障本党的自己的完全的政治独立，保持本党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之摇动犹豫之无限制自由（参看中央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尤其重要的：是使革命的国民党民权主义化，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结构，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涨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

## （六）政 权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本党认为照现在的形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而且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完全只要看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所以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

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还来不及完全消灭国民党），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

### （七）政 权<sup>①</sup>

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全省范围之内，应当称为某省临时革命政府。乡村中之暴动成功之后，革命委员会立刻应当组织农民协会而以一切政权交给他，农民协会秘密存在的地方，必须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使农民协会的指导者加入革命委员会。

城市之中的革命委员会或则某省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暴动胜利

---

<sup>①</sup> 原文如此，似应为“政府”。



之后，就要着手组织新的政权，应用下列的形式：平民代表会议，由各工厂工人，各职业工会的手工业工人或店员，学生会学生，小商人团体的小商人，军队的兵士等以职业选举团体选举的方法（不以区域为选举原则）以人数为标准，公选代表组织之。由选举平民代表会议，选出某县某市的革命执行委员会，城市之中的政权便完全交给他。全省的政权应当由各县平民代表大会选出。各县革命委员会及各省临时革命政府，应当定出召集这种城市平民代表会议或全省平民代表大会的日期，这种日期依暴动之后的形势如何而定，如果组织新政权尚须很大的政治上的准备，则召集代表会议的日期，可以略为迁延。

资产阶级及封建军阀等类的阶级，不应当叫他们参加革命的政治机关。

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的政权万岁！”（民选革命政府）。

## （八）军 队

除去彻底的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以外，民权革命是决不能胜利的。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军阀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佣军队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证据。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本这个目的，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如某市工军，某县

农军的地方性质的武装，不用旧的纠察自卫的名称)，无论如何不能解散他们。从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

### (九) 对帝国主义的策略

民众暴动胜利的地方，如果可以遇见与资本主义列强直接的接触(例如广东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那么，本党应当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应付的策略，使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不至于过早的发动，本党应当继续不断的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领导经济的斗争(如抵制外货等)，同时，如果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可以根本牺牲新兴的尚未巩固的革命政权，——当这种工农阶级民权独裁制还只有很小的地盘的时候，——那末本党应当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夺回租界，没收外国工业使为国有等等)。应当记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的赞助之下(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必定时时刻刻来挑衅，想借口来屠杀，来镇压真正革命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平民政权。本党应当预先看见这种危险，在不利于新的革命政权之时机，不要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赞助之下，等到对于革命最有利的时机，然后要领导中国工农民众去直接的与帝国主义斗争。

### (十)

最近期间本党对于农民运动，工会运动，以及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已经有八七紧急会议各个议决案，并且有中央紧急会议的告全国同志书，这里不再复述。

(据中央档案馆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二期)

# 中央通告第三号

## ——建立党内交通网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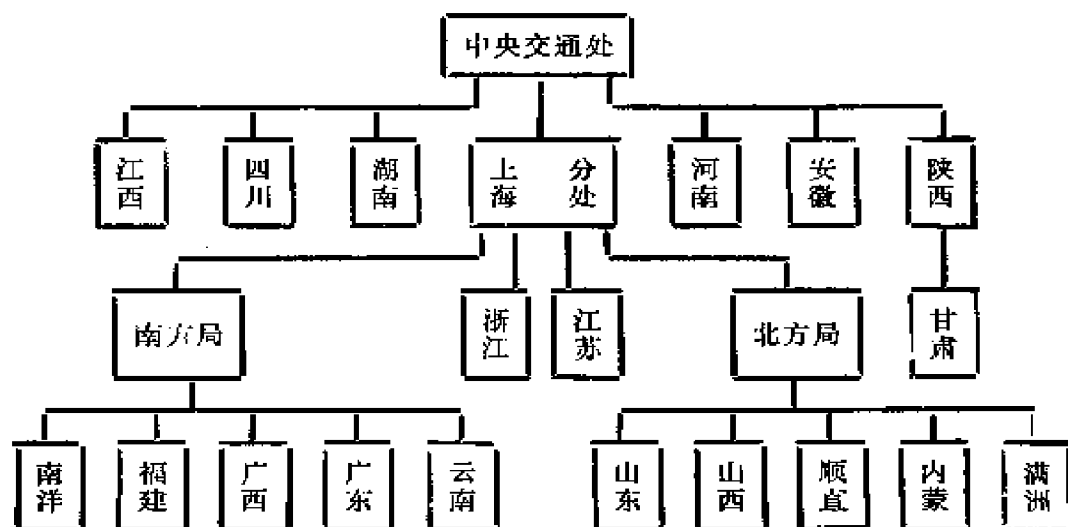
南方局北方局各省委临委：

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此交通网的职任有二：

①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

②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

中央因为经费困难，暂于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于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江浙间交通之总枢纽，暂时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北方局办理，南方所辖各省由南方局办理，江浙则由上海分处办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全国交通组织系统表如下：



交通员到达各地时，不得在当地逗留二日以上，免妨碍交通，如因当地党部特别原故不得已延至二日以上者，须由当地党部给与证明书并供其延留期间之用费。各地党部于接到交通员带到之物件时须立即给与回条，所有交给交通员递送之件，必须尽可能使之轻便易带，望特别注意为要。

吴世荣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本)

# 中央通告第四号

## ——关于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各级党部：

政治宣传和鼓动，乃是党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的条件。此种工作，本党向来就没有加以适当的注意，自从第五次大会以后，中央宣传和鼓动更陷于停顿的状态，近来武汉政变，全国反动，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减少，几乎等于零；到处只见反革命派攻击和污蔑本党和〔的〕宣传和鼓动，而不看见本党的答复，更加谈不上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和鼓动了。这当然是本党很重大的损失之一。客观环境的恶劣固是致此损失之一个原因，但本党自中央至各级党部之忽视宣传和鼓动的工作，尤其应该担负责任，这样的忽视若不急起纠正，则将陷党于更大的损失，尤其在目前全国一切反动的势力——从张作霖代表的势力到汪精卫代表的势力——由实际上和理论上联合向本党猛烈的进攻的时候。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已经确定了党的新政策，为加紧党的政治宣传和鼓动起见，并为整理全国宣传和鼓动的工作成为一贯的系统起见，中央宣传部特决定下列的宣传鼓动的工作大纲并通告各级党部切实依照严密执行：

(一)对内的刊物：

一、中央常务委员会主编《中央通讯》，解释党的政策，批评党的错误，登载党员对于党内问题讨论的材料等；

二、省委常务委员会应时出版《省委通讯》，其性质如《中央通讯》，尤须注意于本省党务问题；

三、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如较大的市委或县委等，亦须出版此种对内刊物。

(二)对外的刊物：

一、中央机关报《向导》重新恢复出版，篇幅减少一半，务期每周出版一期，其性质偏重政治的分析，其他关于理论的文字，即从前容纳于《新青年》者，将来印小册子出版；

二、省委的鼓动的机关报，每个省委须筹备一种，其规模略如从前上海之《市民日报》，即大张报纸之四分之一，内容偏重本地的政治的鼓动，最好是每日出版一次（上海、汉口、广州、天津、长沙必须是日报，其他各省委或临委如力量不及，可出二日刊或三日刊）。

三、省委以下各级党部亦应在能力所及之内，筹备此种鼓动性的机关报。

(三)对内的刊物都用油印出版，《向导》及理论的小册子用铅印，各地鼓动的机关报最好是铅印，不能则用石印，再不能则油印亦可（只要能够出版）。

(四)党的出版物之分配和传播，各级党部应该认明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应该使中央及自己对外的出版物深入普遍于广大的群众，对内的出版物，中央的须使各区委或县委至少有一份，省委以下的则各支部都必须有一份。

(五)各地对内对外的一切出版物以及宣言、告民众书、传单各种重要民众团体、左派国民党等的宣言等，必须各寄中央宣传部每种至少三份。各省委〈及〉或临委宣传部每月至少须对中央宣传部报告一次，报告中须说及各种宣传品散布的方法、发生的影响等。

(六)《向导》在秘密中印刷份数不能过多，因此上海、天津、

广州须设法翻印，以便分配到就近的区域（天津——发散北方局各省，广州——南方局，上海——江浙皖）。再，《中央通讯》系油印，须由各省委翻印。

（七）《中央通告》第十二号中所说的党内问题之讨论，各级党部须切实执行，并须引起许多同志做关于此种讨论的文章，投稿于《中央通讯》。

（八）各支部必须研究党的出版物。

（九）各地必须注意日常的口头文字宣传，应在当地组织宣传队，指示以许多具体方法，每日分配他们按照党所决定的宣传口号，到工人群众及一般民众中去宣传，每组须考核其成绩。

吴 世 荣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三期）

## 中央通告第五号

### ——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自处反动环境以来，本党妇女运动，似乎停顿了一样，这是表现我们的落后，表现我们的极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应该立刻纠正这些落后和错误，并且各级妇女部应在各地恢复积极工作！其职任首先便是：

(一)恢复各级各地妇女部工作（尤其在反动最压迫的地方，许多女同志都在无形中离开了。如现在湖北，即是如此），妇女部负责人，应集合最少数活动分子专去找寻已离开的女同志继续要她们恢复党的生活，尤其是女工方面要督促她们切实地执行。

(二)吸收女工农妇同志，并训练她们的秘密工作的知识（行动技术态度及活动的方法），指导她们的斗争，领导她们（尤其是女同志）参加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在工农团体指导之下），一直到参加暴动中的各种工作。

(三)在工农群众中必须根据党最近对政治上的策略，派人去秘密宣传，务使这种宣传深入群众，以巩固我们的下层基础。

(四)现在反动派极力想拉拢工农群众，而且公开的把工农团体来改组，可是我们无论遇到甚么困难的时候，不能放弃工农群众的。要领导群众起来反对这些官办的假民众团体，所以要在秘密中恢复她们本来的组织，巩固她们与秘密工会的关系，同时可派女同志（可靠的）到反动组织中去活动。



(五) 我们对于妇女运动，必以女工和农妇为中心，所以要集中力量去对付。

(六) 一般妇女运动的团体，必以女学生及其他知识分子为中心，所以也要多注意知识分子方面去努力的(参看第八项)。

(七) 反动派的妇女团体中，本党亦可派少数得力同志去工作，她们应受党的严格的指挥与监督。

(八) 与左派的革命的国民党共同组织各种独立的知识妇女的小团体，如研究社，俱乐部，进化社，慈善团体以及同学会等。经过这些团体，宣传并赞助党的政策。要使她们对于农工运动实力的赞助，秘密与工会中的女工发生关系，并可公开的组织妇女劳动之调查，救济罢工失业等之募捐，宣传农民革命之意义等。

(九)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在她们的营垒中必须根据我们的政策和理论，建筑一种革命舆论的中心！这样才能使她们的力量巩固，可以对抗反革命者的进攻。

(十) 本党妇女部应指导这种知识妇女的革命团体中之党团工作，并参加女工农妇的组织工作。

(十一) 革命妇女的小团体中的分子，可以加入公开妇女协会，在她们之中发生左派党团作用，拆散反动妇女领导的群众(如遇有会场中右派提出反动主张的时候，领导群众反对她；而且不使其通过，或简直使她们不能开会)，揭发她们的虚伪及反动之真面目(如反动的假革命者对于女工所提出的要求等等，我们应领导群众逼其非实现不可，即此可以证明她们是欺骗工农妇女的，使群众不信任她们，而且认识她们不是为真正农工妇女谋利益的)。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三期)

# 中央通告第六号

——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常委通过)

## (一) 今后学生运动原则

学生群众是各种社会阶级青年的集合，当此社会阶级如此剧烈分化的时候，学生群众的分化及其组织之分裂是自然的趋势；今后学运的原则，应当抛弃以前笼统的“统一学生运动”的口号，在学生本身利益一直到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致力于团结左派学生的运动，以推动学生群众的分化，使左派学生群众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参加民权革命土地革命中的各种紧急斗争，同时应分化右派影响下的学生群众以削减敌人的力量。

## (二) 学生群众斗争的方式

学生境遇日益痛苦，革命运动日渐紧张，我们应切实领导学生群众参加政治的本身和思想上的各种斗争。

A. 政治斗争，除领导学生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军阀斗争外，应毫不妥协的反对反动派的国民党中央和所谓国民政府，进行争得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一切政治自由，务使左派学生实际参加土地革命的実施——在学生之中宣传本党最近的政策，及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凡我们指导和影响的公开和秘密的学生会、学联会，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必须跟着党的政策照学生的口吻发

表宣言和主张，绝不能因为组织问题和其他关系而对于政治主张有何让步。要组织革命学生青年，准备他们积极参加各地暴动工作。

B. 本身利益的斗争。因为武汉与南京北京情形同样的反动，我们应打消以前“在革命政府之下减低学生本身利益要求”的观念，而尽量提出学生应有尽有的要求。领导学生群众起来反对政府，将摧残教育的罪名加之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除“参加校务”，“择师自由”，“经济公开”等要求外，应提出“反对军队占据学校”，“反对停办和合并学校”，“确定教育经费及其来源”，“减少学生读书负担”等口号，总之，须注意从本身利益的斗争，去引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C. 思想斗争。现在一切反动思想——反阶级斗争的理论乘反动势力进攻而发展，我们应从反面打破这种思想与理论，从事实上解释阶级斗争的需要，说明中国革命应有的前途，和苏维埃政权的内容和形式，尤须注意解释土地革命是扩大中国革命力量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总之，在学生群众中应从思想上去结合左派学生群众，攻击一切危害革命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此目的，应注意党与团的刊物在学生中的推销，同时注意学生自己刊物的整顿与纠正。《中国学生》应仍出版，使之成为左派思想的领袖刊物。

### (三) 学生运动中的组织形式

当此反动派进攻，革命学生会及学联会不能公开存在，公开学生组织被反动派包办的时候，学生运动中组织原则，应一方能适合于号召群众，同时须求其便利于斗争。

A. 须保存学生会的秘密系统组织，在学生会被反

动派占领或封闭(如北方)而不能存在时，我们应使秘密学联合会能存在，以便号召学生群众，并进行政治宣传(通电，宣言，……)且须使各级学生会间发生系统上的组织关系，在秘密的全国学生总会指导之下进行活动。各地学生运动委员会应负事实上主持秘密学联的工作。

B. 发展左派学生青年团体的组织，因为秘密学生组织不便领导组织学生群众，今后应改变以前“在革命政府范围以内，应集中学生于学联合会之下，不必另组织青年团体”的政策，而加紧发展青年团体的工作，以结合左派学生群众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同时又是我们公开活动领导学生群众斗争的工具。今后应按学校与地域发展此种组织，但不必设立任何全国性之统一组织。

C. 注意破坏敌人的学生组织：在我们领导下的学生会或学联合会不应加入反动派包办之学校和全国或全省学联合会，因此而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应设法使一部分学生组织中立，但我们应派一部分得力的灰色同志参加反动派之各级学联合会之组织，其目的是破坏他们的组织与工作，而进行内部左倾群众的结合和整批退出其组织的运动。

#### (四) 全国学总工作

A. 缩小机关，并完全使其秘密存在，党团书记最近期内尽量督促湘、鄂、赣、豫等省秘密学生组织之成立。设法与各地秘密学联建立良好之关系，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应极敏捷的根据党的政策发表主张。力求《中国学生》能按期出版，并想法推销到各地学生群众中去。

B. 学总应注意，武汉工作，可以与武汉市及湖北省学联建立极亲密之工作关系，协同准备开学时学生中各种活动。

C. 学总负责同志应多与党或团中央接洽，全国学生运动应由党与团共同负责指导，纠正以前团应多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有党负责的错误观念。各级学运委员会应认真加紧工作。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三期)

##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sup>①</sup>)

一、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

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完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

五、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湘南各县分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丰阳、衡山两路，准备须于九月六号开始暴动，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谭醒<sup>②</sup>之师合取长沙。第三区为湘东各县，分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浏阳、平江、〈区〉宁

① 原文无时间，编者根据中央会议记录判定为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② 谭醒，疑为潭醒之误，即湘潭、醴陵。

乡、益阳、安化一路，湘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总的暴动，各区暴动成功之后，除了一部分力量维持本区之秋暴，〈如〉应迅速调〈查〉大部力量直攻长沙。长沙于九月十二、三号应有一暴动，实行取得政权，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南华一路及常桃汉一路，常德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号开始暴发，夺取常德，为长沙声接〔援〕。此中〔外〕湘中之宝庆一带及湘西之醴陵一带亦须有准备于九月十日左右发动，外〔作〕为各路主力之声援，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

六、湖北暴动应划成下列各区：

(一)鄂南区，即武长铁路区，为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嘉鱼、咸宁、武昌(四郊不在内)七县。

(二)鄂中区，为沔阳、潜口、汉川、天门、京山、应城、监利七县。

(三)鄂西区，为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七县。

(四)襄枣区，为襄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县。

(五)京汉路区，为黄陂、孝感、应城、应山等县。

(六)鄂东区，为黄冈、鄂城、大冶、蕲春、黄梅、广济、阳新等县。

(七)武汉区，为武汉三镇与四郊。

许多暴动区域应自鄂南开始(九月十号)，鄂南开始之一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吓武汉，又或从鄂南攻岳州，威吓长沙。襄枣的暴动如主客观有可能，张兆丰的军队又到，九月十号之前即开始，至迟十号与十号后一、二日即须动作，如鄂西暴动胜利，张兆丰军队须速调至暴动

的区域完成暴动直攻武汉，武汉此时须有一大暴动，至少亦应有一大的骚扰(如主观力量暴动不可能时)，鄂西、鄂中暴动可以成功，则张兆丰的军队须用各种方法调往湖南或留在襄枣。鄂中、鄂西、襄枣暴动开始之后，鄂东区、京汉路区须尽量的响应。

七、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事的指导用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行各境当地警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

八、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

对于反唐的杂色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于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酌量予以解散或改编。但这决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

九、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实的结果是全部)，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

十、暴动之前须极端注意兵士中的宣传，鼓动他们起来杀戮反革命的军官；一有可能，便应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这种组织



应是广泛的群众的。暴动之中要吸引兵士参加。这种革命兵士的组织可以做改编新革命军的成分。

十一、暴动的口号：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暴动为死难民众复仇，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恢复一切革命民众团体，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汪精卫，暴动打倒残杀两湖人民的新军阀唐生智，暴动组织革命军，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平民和兵士的革命联合万岁，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

十二、各区的暴动在未发动之先，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农民群众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按照上列的口号加上实际的事实），如发传单、讲演、壁报、告示等。在暴动力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杀戮政府的官吏，宣布革命委员会政权，然后才能发展普遍的暴动。

十三、暴动方开始即须掘断铁路，破坏水陆交通，占领或破坏邮政机关，割断所有的电线，造成敌人的绝端恐慌的状态，然后才可便于暴动的发展。但因交通机关的破坏，同时影响于我们自己的联络，各暴动区域应当提出特别传递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迟延等待某区的暴动，即令暴动发生后各方关系断绝，亦应按照预定的未成功与已成功地点猛烈的进攻，绝不可犹豫，犹豫便是破坏暴动的胜利。

十四、暴动胜利的地方，应无情的镇压肃清反革命。对于买办及反动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经济怠工或封闭工厂，则工会应当占领工厂，以之交给革命政权管理。至于反革命的豪绅则应坚决的没收其财产。但必须注意应用正式革命政权机关实行这种没

收，严禁私人的抢掠侵吞。

十五、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

十六、各区的暴动内部的指挥为各区的特别委员会，直接归省委指挥。武长铁路如发生指挥上的不方便时，两湖省委的特别委员会即应联合组织归中央直接指挥，同时受两省指挥。

（原载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四期，有删节和错漏字。现根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十一期的记载补正）

#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在武汉方面的消息太少，各地亦无报告，因此今天的报告无多的材料，自己无完全的关〔观〕念，只能作一简单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从宁汉妥协说起。

自宁汉妥协后，我党发表《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我们在此告民众书中说明汉宁妥协之意义，说明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都是我们的敌人，更说明第三派不过是反动的桥梁而已。第三派第一步的主张是“联共反蒋”；第二步是“反共反蒋”；第三步是“只反共不反蒋”。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八月半，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则大叫其蒋倒是党权的胜利，但汪一到南京即马上改口说蒋是先知先觉，自己承认过去只知反对反革命不知反对共产党，并且还到上海预备去迎蒋介石出来。总一句说，从八月十五到现在，汪精卫等已完全投降了蒋介石一直到西山会议派了。这一个月可说是此种形式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南部已经是清一色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无论这种清一色的政权之内部有许多冲突，然而他们对于民众仍然是同样的东西，莫有二致。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固然不能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尤不能与军阀作斗争，因其本身即系军阀。他完完全全是工农的敌人，在我们的告民众书中亦曾说明此点。党的紧急会议亦采取了此精神。

“八七”党的紧急会议的政策即是暴动政策，此政策决定后我

们的工作可分三部分：一、贺叶南昌起义及广东的农民暴动；二、湖南的农民暴动；三、湖北的农民暴动。在客观上革命的潮流是否仍在高涨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是在高涨的，工农是要求暴动的。武汉反动之后，到处在改组工会、农会，并停止工会、农会的行动，这自然是在向工农进攻。而资本家向工人进攻的形势也是很明显的，自政府命令将所有工会解散之后，资本家即大大的开除工人，实际上因钞票的关系，工资一天一天的减少，武昌几个纱厂并延长工作时间，京汉粤汉路工人有欠薪至九、十月者。凡此一切，都是现时武汉的所谓国民党之工会改组帮助资本家的政策，欺骗工人，蒙蔽工人，同时还要乱叫“三民主义”“非资本主义前途”……政府可说是完全代表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开辟向工人进攻的道路的。无论他们一天说许多空话都是无用的。如汉口中交银行近来开除许多雇员，国民党党部(工人部)及工会改组会等，曾经假意去函向该行要求恢复这些工人的工作，该行竟答复不行，国民党部亦无如之何，反而由党部及工会改组会替银行方面设法，介绍被开除工人以别项工作。由此可见武汉资本家正需要这种所谓工人运动，好帮助着他们压迫工人。今天报载有一粤汉工人廖某被捕，假工会去函要求卫戍司令部释放，而卫戍司令部亦回信不允，并说廖某提出了要求发现洋的口号，有共产党的嫌疑(以他们所搜得的共产党职工运动决议案的条文为证据)。如此，工人实无出路。武汉如此，其他各地亦是如此，这也是可以从外地报纸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实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暴动推倒军阀的统治，建设工农民权的独裁政权，然后才有出路。说到此处，我们还要注明的是：工人不及农民的斗争情绪那样高，这是因为工人在反动局面之下受了一个大打击之后，找不着头脑，不知要如何的办法才好，而我党又没有去领导他们，以致如此，而比较

安定一点的工人则更呈畏缩的状态。最近听见有洋车工人说：过去共产党的工会不好，要收会费，还要叫我们去游街，现在的国民党工会算是也不游街了，但也不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是要发国库券。这种群众无出路的心理，我们是要特别注意的。据上海报载：上海工会统一会最近到各工厂去得非常之多，有点事即去，他们这种积极的干去，如果共产党不能正确的领导工人去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也可以在这种工人无出路的形势之下，替工人解决一些小问题，得到一点基础。最近上海省委欲在蒋介石下台的时候作一示威运动，结果未成功。现时工人群众，尤其是武汉，没有积极斗争的形势，这是由于受了我们过去党的退让政策的影响，群众已非全为我们可有了。现在各处的工人都无出路，已经在那里要求我党去领导他们斗争，我们目前也在如此做了，但武汉方面则已迟了许多，这是不可讳言的。

农民在广东、两湖是已经开始暴动了，河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也有不断的骚扰，中国革命已到土地革命的阶段，要由无产阶级坚决的领导农民，完全肃清土豪劣绅，推翻军阀地主制度，建设新的平民政权。说到农民暴动的具体形式，在鄂南农民的“实力”本来并不大，但居然能够大干起来，湖南也有许多地方干起来了。据湖南省委的报告看来，湘省的暴动还有多少胜利的可能，也可说是湖南农民算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是最先进的。过去在湖南完全表现两个政府：一为唐生智的军阀政府，一为农民的农会政权。说到此处我们回想到帝国主义之聪明，当省港罢工的时候，帝国主义即说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当湖南农民协会力量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农民协会是第二政府，当武汉民众势力非常之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湖北省总工会是第二政府。帝国主义对于此第二政府之危险性是看得很清楚的。国民党领袖本站在这两政府的挑选的地位：那时的形势是，或者国民党站到

这第二政府方面来，真正领袖〔导〕革命，或者站到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方面去，使国民政府完全变成他们的政府，实行其领袖〔导〕反革命。可是他们挑选的结果，并不说此第二政府是最民权的，反而要站在新军阀方面来消灭此第二政府——这正是帝国主义所要求的。现时这第二政府是暂时消灭了，可是他重新起来，变成唯一的政府，这就是暴动的意义。目前我们两湖暴动的计划是在鄂南胜利即向岳州进攻，同时集合湖南各地的农民力量合取长沙，拿得湖南的政权。这个计划并不是空想的。贺叶公开与反革命分裂，一到广东即可引农民的暴动，但粤省委仍应以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只有如此，然后才能使贺叶的军队更加改变其性质，更成为革命的军队，如果广东、两湖三省的农民暴动都起来了，全国即可改变一个形势，进到土地革命的新时期。据报载，香港九月九日的电说：各县农民“土匪”相继起事，并非贺叶已到该地；又一消息说贺叶并未到浚口，乃共产农团自动起事。由这些消息我们可看出广东工农并不等待贺叶来到才开始暴动。但不知党在这些暴动中的指导作用如何？从报上看来汕头暴动都是很有计划的，——汕头在九月七日一日之内发现十九次炸弹案，如果党不在那里指导，这样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斗争中我们的力量有四种：一、工人的力量。工人在现在的资本进攻的压迫之下实在没有出路，只有实行斗争之一途，而且现时的经济斗争，都必然有急转直下变成很明显的政治斗争——一直引导工人的意识到非暴动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二、农民的力量。在目前反动的政权之下，农民也无出路，抗租抗税的口号可以适用于一般农民；三、我们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党应很有计划的去领导工农实行斗争；四、贺叶的军队力量。这个力量在新的阶段中亦有很大的作用，过去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农民暴动，一起即被压服，那时还是揭竿而起的

时候都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敌人已经有了很厉害的枪炮，已与揭竿而起的时代不同了，所以现在的斗争，军事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对兵士的工作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仅仅是为国民党军队当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或者站在外面为国民党的军队宣传，或者为某将军运动收编扩充军队等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对于我们一点益处也没有的。现在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应该是要作兵士的工作，即在贺叶军队中也应如此。如果照我们过去在军队中工作的方式，我们那时虽有十万军队在手，亦未必不与国民党军队一样，各样各色的坏分子都包括在内，绝不能实行土地革命。我们必须与工农群众与兵士群众联合起来，要使敌人的枪杆子变成土地革命工农的枪杆子，如果我们能够将工农兵士的力量在党的指导之下集合拢来，胜利是必有可期的。

据今天的消息看来，两湖暴动的情形仍然是很好的，固然，亦许集中不成功，取不到湖南的省政权，因此而只变成各地异军蜂起的零碎斗争，但是最近的消息仍是证明工农暴动有一击而中取得两湖一部分政权之可能——因为治者阶级的统治非常动摇。

客观的情形表现给我们看出：全国已在一个经济危机的状况中，无一个地方不闹财政的恐慌及租税问题，这种恐慌使反动政权无法巩固。小资产阶级在这种恐慌之下也无出路，或者他们也有依附汪精卫式的政治路线走到反动之一途，但其结果仍然是受骗。现在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问：中国现在的政权是否完全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呢？我们的回答：中国资产阶级并没得着全国的政权。汪精卫等在反动的开始还想利用资产阶级的口号来欺骗民众，但是不久他们即用不着了，完全投降土豪劣绅了。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现在也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形成他们自己的势力和政权。广东古应芬强迫商人出捐的时候，上海商界竟通电反对，这种情形已与他们处在北京政府之下不同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资

产阶级已在那里自己形成一力量。现在的政府决非代表“民权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因为中国根本上没有民权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与豪绅阶级非常之密切的联系着，在政治上是“最卑劣残酷野蛮的资产阶级”。这亦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他并不能有全国规模的政治领袖及政纲，他的封建性非常之重，他们内部有许多矛盾冲突，同各省各县的豪绅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联系着。

在目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是：一、拿他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形式来引诱一般小资产阶级，这是于新军阀有利益的；二、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日甚厉害，使他们的政权不能稳定。唐冯李白<sup>①</sup>部下的冲突都可以说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一得政权，内部的冲突即表现得非常厉害，以致不能稳定其政权，这是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因为很明显的，现在前途有两个：一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是工农的政权。

宁汉妥协后仿佛国民党统一了，可以打北京了，但此统一一开始即马上发生了许多冲突：第三派与蒋介石有冲突，与唐生智也有冲突，唐蒋、唐冯、靳<sup>②</sup>冯都有很大的冲突，汪等去因不愿当一派势力的小老婆，所以又要请蒋介石回来，传说蒋已回，如蒋一回，很明显的马上会引起极大的纠纷，其结果，汪精卫等第三派的政治领袖，将要被各方面所厌弃，明显的露出蒋介石主义的大胜利。今天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就开幕了，唐生智是未开会之先即不去，宁方的人都反对他，唐冯已干起来，靳冯也干起来，并闻唐最近的战略是用的远交近攻的方法，要与张作霖，孙传芳讲交情了，从他们的内部的冲突看出军阀政权之不巩固，同时我们要明了的，所有他们的战争统统是军阀的战争。

① 即唐生智、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

② 即靳云鹗。



在现在状况之下，实际上说来，国民党已经解体了，无革命的力量了，帝国主义可以进攻了。当工农还与武汉政府在一块儿的时候，帝国主义是非常之害怕的，现在国民党既已无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当然可以乘势进攻了。帝国主义进攻的方式可分几种：一、用老的方法在中国施侵略，如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向奉张要求实行二十一条，引起满洲的反日恶潮即是；二、向南京政府进攻，以便挑选新的工具。——帝国主义也要在新军阀的冲突当中来挑选他的新工具，但他挑选的方法是采取的进攻的方式，看谁能最听他们命令他们养谁为其新工具。南京政府早已无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如上海的对日大同盟已公开的借口山东的日本兵已撤去而发启事自行取消！这可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而武汉报纸上亦已承认关税自主不能实行了，即此可以证明国民党叛徒已非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为障碍革命发展的力量了。而汉宁两个叛徒政府之合在一起，完全维持了土豪劣绅的政权，帝国主义现在已间接的利用这一工具，在将来还要格外进攻，从进攻之中挑选这些新军阀中的工具；三、帝国主义对于工农的革命力量，或将取直接用兵干涉的形式，最近广东惠阳地方，英国人已经直接“剿匪”，他们的香港报纸宣传李济深决不能抵敌贺叶，这亦许是他们准备直接出兵广东的表示。

最后讲到党的问题：一、目前我们的政策是暴动政策，主要的是要引导工农群众暴动，即工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也要以暴动为目标。我们应坚决的实行紧急会议的决议，但现在机会主义的余波尚非常之多，我们应以很大的力量来与之奋斗。在组织上，我们应当督促各省党部作报告，看他们是否照紧急会议的决议在那里执行，是否提拔了新的积极分子起来作党的工作。二、要注意秘密的工作，各地近来之机关破坏，都是由于自己不小心，秘密工作作的不好，这是要很注意的一件事。三、我们党内的知识

分子，在目前整个的革命潮流中或者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放出消灭 C. P. 的理论，这自然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与机会主义有关系的。我们相信革命潮流继续发展下去，还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危险，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四、党内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党内作技术工作的同志，完全靠党来供养他们，如果党有时发给他到某处的路费少了一点时，他即发生许多的怪论出来，这种现象非常之坏，在此新的时期中，应将党再造起来，在技术方面都要变更，党的成分应当是：一、绝对无法在外面谋生活的而必须在党中负重要责任的“革命职业家”；二、工农分子(本不受党的供养)；三、知识分子，这些分子应当有自己的职业，务要达到每个同志都有牺牲自己的力量和金钱来帮助党的精神，不要存依赖党的心理。

总起来说，在现在形势之下，党负了很大的责任，一定要党内及政治上有坚定的统一的意思，才能负起这个很大的责任，同时也只有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才能挽救党的危机。

(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一九二七年《中央通讯》第五期)

## 第四部分

# 关于八七会议的 评论和回忆

---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政治决议案(节录)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在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什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標，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分，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

固然，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可是这种缺点绝不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的极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八七会议的主要决议完全赞同。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6页》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1181页)

##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节录)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周 恩 来

第二，对“八七”会议的总结。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

第五，秋收起义。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西、鄂北等

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了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拚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 171—174 页)

##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节录)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瞿 秋 白

共产党遵国际电令退出政府，同时国民党七月十五日的分共会议也开了。武汉的反动已经开始，何键已经动手拿共产党，他们的兵士“示威游行”，群众丧失了“头脑”，他们的“头脑”是自己渐渐的掉下。共产党中央最后的宣言，只是从掉下来的头里所发出的惊人的呼喊，但仅仅只是呼喊。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这宣言虽然还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此后，中央经过一个散乱的状态，转到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八七会议(这期间的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汉口)。八七会议，真所谓接受的遗产太坏了。八七会议之前夜，中央经过一时的犹豫，决定要招集紧急的中央全党〔委〕会议。但是，因为当时交通困难时期迫促，所到不足人数，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沪的新书记邓中夏同志能来。这会议是有国际电令及新国际代表的指导而召集的。虽然人数不足(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不能作为正式的全党〔委〕会议，但是因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之紧迫及改变党的路线之重要，决定宣布开会，作为中央紧急会议(并非什么“改组会议”)，并预定改选中央政治局，作为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之前，中央即：(一)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二)决定叶贺南昌暴动之举行，(三)发布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七月二十九日)。这已经是新的路线，主要的意义是发动湘鄂赣粤的群众暴动，重新团

聚已受很大损害而散乱的革命力量，发动共产党员军官之下级军队独立奋起与国民党左派军队(贺龙)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武汉中央及蒋介石、李济深的统治，以革命的政纲号召左派国民党群众起来共同奋斗。这是八七会议之前夜。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新的策略路线，方才正确规定出来。但是有两个缺点：(一)因为土地党纲的始终没有确定，始终没有明晰的对于中国封建的亚洲式的生产之土地的特殊制度之观念，所以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对小地主则增〔减〕租”的策略是模糊的，使地方党部往往仍继续对于土地革命的观念，认为农民自动的没收小地主时，党的任务仍是应当加以阻止，虽则八七会议对于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规定出来。(二)因为对于国民党左派群众，号召其反对宁汉反动中央在当时是必需的(南昌暴动发难期间)，于是这种行动政纲过于伸张，而根据之来决定暴动时的政权形式问题，仍认为“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的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这当然是不对的。可是，八七会议始终有极重大的意义，当时共产党简直是在溃散的状态之中，他将党救出来；他只是洗刷旧的机会主义，建立新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第一步，没有他，共产党简直就要“亡党”的。八七会议改选五次大会的中央政治局，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将机会主义的错误都明显的无所隐藏的指摘批评出来，这在政治上组织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政治纪律的执行是极严厉的，他要求旧的中央政治局承认这种严重错误。这会议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会议上决定对于农民土地革命及职工运动的新路线，决定党的组织问题的新方针。会议批准七月二十九日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的政纲(会后即由临时政治局根据之而决定政治任务案)。这些不但是纠正旧的机会主义



错误，并且是适应新的秘密环境——党自七月十五之后从公开的变成绝对秘密的新环境，关于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八七会议之时，第一便是领导武汉工人以总同盟罢工反抗汪精卫的反动政府“改组”工会及民众团体（七月三十一日军警枪杀汉口车夫，八月三日宣布总罢工）；第二便是指导贺龙军队的南昌暴动。八七会议之后，南昌军队日渐前进到江西边境，交通与中央隔绝。中央的指导只能经过广东的南方局。再则，当时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又遭着严重的白色恐怖，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对于全国需要重新的大整顿，组织工作极其艰难而重要，中央尽自己的力量派许多新的同志到各地去指导，传达八七会议的新决议。同时，决定暂留武汉指导两湖的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之后不久，武汉的国民政府之“东征”变成了“宁汉妥协”。中央就发布告民众书，号召工农兵士民众以及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这些反动中央。从这时候起，到叶贺汕头失败是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之中，中央继续的对党内实行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是有很久的历史性，而且普遍于全国各省党部。不去掉这许多余毒，党的新策略是不能切实的执行。这期间，第一是叶贺南征的问题。叶贺南征是在八七会议以前很久就决定的。当时，已经决定取消叶贺军中的“国民党中央里的共产党党团书记”谭平山之职，使他不能以此名义而为军中的最高指导者；另行指定前敌委员会，以恩来为书记，平山不加入，并在七月底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代表，去军中督促举事。然而叶贺南征中，曾经有许多机会主义的余毒爆发。最先是国焘同志为联络张发奎问题而踌躇动摇。可是前敌委员会始终决定了举事。叶贺南昌暴动，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因为他是代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群众，共同反对陆续背叛国民革命宁汉中央之最后的奋斗，因为这是真正的奋斗。但是我党在军中的指导机关与中央的指导隔

离，仍旧余留着“国民党主义”的毒。这也是使失败的原因之一。军队到潮汕之间，工农群众说：“这是蒋介石的第三的军队”，这还是要“耕者无其田”。为什么，因为一则军队中指导机关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二则军队并不勇敢的镇压捕杀豪绅工贼。叶贺南征之中，政策的客观倾向是继承国民党的革命方法：（一）纯粹想靠组织好的军队力量取得地盘和政权；（二）以“王者之师”来解放民众，实际上是以仁君易暴君的办法，所以对于“安宁秩序”只是保护豪绅统治的旧秩序；（三）是偏重于用联络杂色军阀——某种军队或武力，勾结敌军的军官倒戈（并非鼓动兵士）之投机办法。总之，是不发动群众不信任群众。中央对于这些错误的指正，因为交通的阻隔，一直到贺龙差不多完全失败之时才达到，一直到失败之后才得到前方报告而详细报告全党。但是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便早已对于其他各省有类似的指示，例如江苏及湖南。第二问题，便是湖南秋收暴动的问题。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的命令达到之后，虽然高谈着中国革命已经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虽然说土地问题上连没收自耕农土地也要提出，虽然说已经要提出苏维埃口号而不要国民党，但是，实际上省委是想着：如何由党夺取政权后，实行法律的没收土地，安插老弱“以安人心”，并不实行派遣同志到乡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去鼓动长沙工人，领导他们起来斗争而暴动，却只要中央调动某某两个团兵力于八月三十一日去打长沙。此之谓“暴动”，这显然是机会主义的某种遗毒，仍旧脱不了国民党式的军力主义与仁君主义。当时，湖南是直接在马变之后，农民协会的政权时期，还活跃于群众的回忆之中，唐生智军队大半在皖鄂，豪绅自马变以来时时在受农协袭击的危险之中。所以中央八七会议决定“农协政权”口号特别号召两湖秋收暴动，是实际的政策。当时就轻轻然的争着苏维埃口号，至多只有“科学的”意义——书

本上的意义。中央所以坚决的指正湖南省委再另规定两湖秋收暴动计划，而湖南省委忽然勇气消散，在醴陵、株州等处暴动起来之后，反又取消长沙的九月十六日暴动。中央曾经与以严厉的批评，并召集湖南省委紧急会议，改组省委。第三是鄂北暴动问题，湖北秋收暴动期间，鄂南等处确能发动群众的斗争，直到截断武长路半月之久（虽然当时的发动方法，多偏向于游击式的）。鄂北却成问题。鄂北有共产党员张兆丰的军队将到，中央在八七会议时便派特委去指导准备暴动，但是特委没有去认真发动群众，不去领导当地群众反对捐税及樊锺秀的统治，仿佛认为农民还未抗租并无土地之争，即不能动；一面又有拟令张兆丰去联络樊锺秀反对方振武<sup>①</sup>的军事投机的计划。中央亦屡次指示这种机会主义的国民党式的余毒。第四是江苏蒋倒时期的“暴动”问题。那时宁汉妥协，蒋介石下野，上海政权在更迭反动人物之际。自然，反动统治因为内部纠纷而混乱。江苏省委便决定夺取上总旧会所，而称之为暴动。这显然是不顾群众力量的冒险主义。当时国际代表便加以制止。同时，江苏省委那时还决定联络周凤岐以打击蒋介石的势力，中央立即加以纠正，因为这更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很危险的投机主义。幸而那时江苏省委在国际代表指导之下即时改变决定，取消已发出的行动大纲。再则，蒋下野时汪精卫东下，江苏省委之国民党左派党团书记王若飞，竟在中央反对宁汉反动之际，指导“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去欢迎汪精卫，这也是旧时取巧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余毒。国民党的联段反奉、联奉反吴式的策略，也是这样使他们党员取巧的在奉段之下因捧奉段而偷生，我们在国民党时期不幸也染着这种陋习，而其余波直到八七会议之后！第五问题是广东暴动问题。叶贺南征期间，广东的秋收暴动

<sup>①</sup> 樊锺秀，河南地方军阀；方振武，西北军的一个军长。

与两湖江西的不同。江西是农运较弱，而八一南昌暴动之后，党在一时期散乱的状态。两湖是城市中心新受武汉反动的摧残，及党内机会主义政策影响最直接的地方，工人群众的行动被机会主义所麻痹得最厉害的地方，武汉尤其在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反叛的状态之中。两湖的秋收暴动，却差不多纯全以工农自己的武装的力量来战胜豪绅资产阶级。广东就不然。叶贺的南征是以潮汕以至广州为目的，夺取全省政权的目标最为切近。然而正因为叶贺南征，使广东继承旧有的等待主义（布置农民暴动的方法，很象湖南省委毛泽东的合拍主义，——就是死板的预计军队攻守的地域与时间，以规定工农发动的程序）。在国民党时期，各地总有些“等待北伐”“等待东征”的心理，去做工农群众中的工作。现在广东便是“等待贺叶”了。再则，暴动政纲上拘泥的规定对小地主减租至百分之三十，而农民暴动的指导，也差不多仅只是农军行动，与湖南的倾向相同。第六问题是顺直“大暴动”的问题。北方奉晋战争发生，北方局就立刻决定六区域的“大暴动”（三特区、南口、京津、唐山、京东），一听到张作霖失败消息的传闻，立刻下令（十月十日？）叫天津唐山暴动起来；原定暴动计划纯粹是军事的，并准备天津站不住退往热河去与外蒙联络。这不是发动群众的政策，这亦显然是国民党式的军力主义，而且显明的目的，不是建立工农群众的政权，而是想造成第三个五卅似的，以“大暴动”来发展工农会和党的组织，及“建立我们的军事势力和根据地”。同时，玉田暴动之中，第一次是见着群众而指导者吓退，反去解散群众，第二次又干那单纯的离开群众的武装队攻城。

八七会议之后的第一时期，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难产时期。机会主义的余毒牢牢的捆绑着党。中央的临时政治局以极艰苦的力量，领导全党同志开始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国民党时

期”的旧习惯方法，还很久的力争他自己的存在权。上述的几个例子，不过是显著的。其余陕西、河南、福建、浙江、云南、江西、安徽，差不多没有一省不经过这种斗争，党内方才开始萌芽新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国民党式的“革命方法”，军力主义、仁君主义、投机取巧的主义，用各种方式表现我党党员的政治观念之中。机会主义不在于我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而在于我党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化。国民党的真正左派，也只会主张以投机取巧的方法，仰仗军力来做仁君的革命。他们总算的确是确要革命的，但是他们只会如此革法。共产党要剔除这种机会主义的侵蚀，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要经过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长期的剧烈斗争的。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国民党时期的遗产，在八七会后还很久的保存在偏僻的省分。例如国民党党部在同志指导之下的，有安徽、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从八七会议之后直在现在，先后陆续的来“请示”，是否还保存这些机关，以作“灰色运动”之用呢？当然中央回复是不要保存，因为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即使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不能在他旗帜之下来反对他的中央和执政者了，那反是替他文饰一下，模糊民众的革命意识。必须起来反对国民党，退出国民党，才有真正革命的意义。这是一种遗产。其次便是国民党军队中还有共产党党员的军官或其他职员(政治部等)，如河南、陕西、安徽以及云南，至今还有小小的力量保存。他们也是常常想着怎样偷生在里面，亦许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慢慢准备军事或“保护”工农吧？中央亦是指导他们果断的行动，指导当地党部坚决的利用可能而实行兵士运动。直到现在，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的遗产，真是久远而经用呵。

然而国民党时期的遗产，并不是因为与国民党合作而有如此之坏的废物，国民党时期的遗产之中，还有直接包含孕育着新时

代的宝物苏维埃革命。广州苏维埃暴动只是更显著的一例罢了。但是，这还可以等一等再说。至于那些废物呢？中央在八七会议时便已断然的抛弃。至于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则南昌暴动后，江西、湖北许多左派领袖，以及中央的于右任、经亨颐<sup>①</sup>等都纷纷宣告“我是没有参与南昌暴动的”，大大小小的“真正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信徒”都避之唯恐不及，并自告奋勇去骂 C. P. 杀 C. P.，以表清白。我们的八七会议是错了这一着。群众先我们看见青天白日的旗帜，变成白色恐怖旗帜了。国民党左派已经是绝无生存的余地了。所以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九月十九日，便议决“暴动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进行暴动”。国民党是已经死灭了，已经整个儿被豪绅资产阶级霸占去了。自然，零星散乱的一个两个的国民党左派，还是会有有的，普通反对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还是会有有的。然而我党的责任，从此之后，便是举起苏维埃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旗帜。一切革命分子，不论是共产党与否，除非他不革命，否则都应当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六月廿日在苏联出版）

<sup>①</sup> 于右任，经亨颐，均系国民党元老。

# 党的机会主义史(节录)

(一九二七年九月)

蔡 和 森

“八七”紧急会议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纵然在严重情形之下，不能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中央，发展讨论；纵然中央及全党的组织问题，还无很满意的解决，然无论如何总是公然的正式的承认了自己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是国际不懂中国情形，政策过左，以致中国革命失败；也不是我们有错误，国际也有错误），公然的正式的接受了国际的新方针。由此会议救出中国共产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挽回了全国工农群众惶惑恐慌的大危机，树立了工农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新大旗。

自然“八七”会议不过开始承认与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不是这一次便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遗毒在党内还是很深的。然仅仅是这一开始承认与改正便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八七”会议未郑重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是一缺点。会议之末，和森曾提议讨论此问题，以为未宣布没收土地，掀起江西本省的农民暴动，未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而即出走为失策。然当日已没有时间容许讨论此问题。第二日新中央开会，和森又提议前敌主要负责同志有怀疑新政策之弱点，应注意指导人问题，然是日亦不容许讨论此问题。

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为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平山同志不必论，国焘同志自从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来，开始表现他政治上弱点，尤其怀疑土地革

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国焘同志在五次大会前，素来的倾向大体都是很好的，在五次大会后的七人政治局中，除开始月余消极一点外，也还没有严重的错误，即有也是旅〔屢〕进旅〔屢〕退的。国焘同志严重的错误，是开始主持常委之时，所以他赴南昌去时对于暴动是没有决心的。

虽有广东、两湖之失败，然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

国际训令初到时，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为党在组织方面没有出路。亦农同志甚至说：“即使在政治方面有出路，组织方面是无出路的。”又以为党没有家长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疑，非常害怕。现在“八七”以后的事实可以答复这种顾虑和悲观。

“八七”以后，只有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四分五裂，不成东西。我们的党适得其反，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 137—143 页）



# 党 史 报 告(节录)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

李 立 三

“八七”会议在中国党开始了新的阶段，的确是开始党的布尔什维化的会议，对于过去机会主义毫不客气的予以严厉的批评，坚决指出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党的新路线，把党由机会主义的泥坑挽救出来。

现讲一讲“八七”会议的情形。在“八七”会议以前党已决定了南昌暴动，同时决定了我到九江去，不久恩来同志也到南昌。因此五人中央变成三人中央。当时有一个争论就是有些同志意见就是要把中央移到南昌，以中央直接指挥南昌暴动。但其他同志反对这个意见，以为这是错误，因为中央移到南昌必然使中央跟着军队跑，结果全国失了指导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没有这个决定。

当时武汉的党完全是崩坏的状态，一般同志都在各自逃生状况。注意到以为如何做，注意到失败是什么原因，是非常之少。当时毛泽东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为国民党已经死了，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党——就是工农的党，但当时很少注意这个意见。蔡和森同志主张中央坚决整顿全国的党。其他同志全部在恐慌状态。这时党的形势是非常崩坏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之下，叛党的状况〔况〕开始发生。首先叛党的就是施存统<sup>①</sup>，他是叛党开始的第一

<sup>①</sup> 施存统(1899—1970)，别名复亮。一九二〇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二年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在上海大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副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等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病逝。

个人。他是历〔党〕史上很早的一个人。这个人叛党对党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他在报上公开发表他的言论。在此形势之下，武汉许多同志公开宣布脱离党，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这时可见党的崩坏非常之快，因为这时党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脱离党的事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上海工人群众在武汉叛变后摇动非常之大。武汉叛变以前不久，上海延年同志牺牲，十一月以后，在上海艰苦工作的赵士〔世〕炎同志亦牺牲，他们都是很坚决的同志。北方的党这时始终是机会主义，始终等待北伐，其工作只是宣传北伐，使北方群众都是等待。领导北方工作的是乔年同志，在历史上表现，乔年与延年是相反的。北方的党，在“三一八”事变以后完全停顿在等待主义。革命浪潮这样高涨，并未能冲破机会主义之重围，未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中央局派彭述之组织北方局，但他不去，他在这时写了一本书《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此书主要是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与以前对资产阶级让步是一贯的政策。湖南的党在马日事变后崩坏亦很厉害。当时决定积极举行秋收暴动计划，是五人中央过渡时间的决定。后来决定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这一工作，派了七八十人回湖南各县工作，对湖南工作有相当的挽救，但在全部说起来有瓦解的形势。不但中央，就是各省都是如此。什么理由？这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主义的关系。政治上机会主义，使党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因为政治上没有出路，所以党一天一天崩坏起来，没有办法维持其组织。在组织上亦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党是一个暴发户，在四次大会时期九百八十人，在一九二七年，五次大会时期发展到六万人。因此，这时党的领导都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过去党的发展开始是知识分子，工人同志非〔常〕之少。多数是知识分子。工人同志只是安源、上海的工人，没有强固的领导。

大批人加入党，固然工人加入党是使党的力量增加，但投机分子非常之多。在这样情形之下，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投机分子进来，无疑问的革命失败他们通通跑去。这时党的崩坏状态非常严重，假使这时没有“八七”会议，则党的崩坏不只到这个程度。“八七”会议政治上使党有新的出路，组织上使党有新的生命。“八七”完全在国际指导之下。在五次大会以前党内尚有反机会主义的话，在五次大会以后党内完全没有反机会主义的声音。假使没有国际的指导，党便无坚决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时国际派了那文拿夫<sup>①</sup>同志到中央，他非常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他一到中国来非常严厉批评机会主义错误，曾对陈独秀、谭平山公开的批评。这时五人中央是在动摇中，国际不是这样，中国党完全破产。国焘同志不同意陈独秀退出中央，而且以为没有办法召集会议。国际代表经过两次三次催促，并声言如不召集会议他便直接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派人来江西征求对国际的意见。我与恩来在江西这时还是动摇，秋白同志在庐山与鲍罗廷计划南昌暴动，我们与秋白讨论，秋白同志指出我们应认识武汉失败是机会主义失败，固然要维持组织上中央的威信，但政治上路线是非常重要的。在武汉，和森同志主张坚决同意国际代表的意见，他的观点是在组织上的，但对政治上机会主义完全没有感觉到。国焘同志仍然是动摇的。这时武汉接到不正确的消息，谓南昌暴动计划动摇，决定派国焘同志到南昌来，因此召集“八七”会议参加的人除中央以外只有湖南代表，中夏以上海书记名义出席（当时决定派中夏到上海，未去），我没有参加“八七”会议，其详细情形不知道，和森同志参加这个会议。国际代表在会议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使每个同志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中没有争论，一致

---

<sup>①</sup> 即罗明纳兹。

反对过去机会主义，完全同意国际新的路线。在“八七”会议上决定了政治决议案及告同志书，这告同志书对全党的影响非常之伟大，使同志得到新的生命。过去许多同志在实际工作上感觉到中央政策不正确，但中央屡屡骂同志过火。湖南有许多同志坚决主张土地革命而受处分，甚至捉地痞流氓时候有许多同志坐牢。这时同志政治上觉得中央不对，不过说不出道理。告同志书一出，同志感到这精神非常正确，使一般同志由颓丧状况之中走到积极道路。“八七”会议主要点是号召广大群众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政府，同时决定提出以组织苏维埃为宣传口号，决定暴动政策冲破过去机会主义，决定暴动没收土地口号，使广大群众得新的生命。当时广大群众亦停顿在没有办法状态之中。这一次决议使广大群众知道出路。党以前许多事实表现使群众脱离党，特别在马日事变。“八七”会议的决议重新使党在群众中威信建立起来。当时广大群众拥护这个政策。群众除自动手推翻地主〔外〕是没有出路的。当时武汉政府叛变，使中国革命受了严重打击，但这不是最后的失败。广大群众没有受严重的创伤，革命力量依然存在。上海、广州的群众当然受重大创伤，但其他地方如湖南、湖北、江西并未受严重创伤。因此很明显的，党如果有坚决的政策，可以使党走上新的前途。这时党决定暴动，在革命形势之下是正确的。只有这政策才能挽救党及使群众有新的出路。“八七”会议以后，党的崩坏状态挽救过来，这是值得注意的。党开始走到布尔什维克化，在组织上“八七”会议提出坚决改组党，引进工人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负责任。组织上的决议同样有重大意义。过去党始终停顿在小资产阶级身上，是非常之危险的。只有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强大起来，才能使党走到布尔什维克化。在党的领导机关引进工人分子，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在组织上是最正确的办法。当然，不要弄错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动摇，每个工人分子都是

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社会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坚决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可说是无产阶级化，工人分子也有许多犯了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能说每个工人分子都可以代表无产阶级意识。不但中国是如此，各国亦是如此。这点在现在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但在当时曾发生这个问题。即俄国党当时亦发生过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如不脱离小资产阶级意识可以领导到极危险的机会主义路上，可是坚决站在无产阶级观点上的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是很大的帮助。“八七”会议以后有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是错误的。为什么要引进工人分子，在一般说起来，工人分子是经过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比知识分子要坚决得多。“八七”会议不但政治上而且组织上使党有新的出路。不过今天来分析“八七”会议，他还有一个缺点：第一，没有决定脱离国民党，感到仍要拿国民党旗帜来做国民革命，还要团结国民党左派群众观念当然是不正确的。广大工人、农民不要国民党旗帜，国民党在武汉叛变后压迫工人、农民非常明显。马日事变〔使〕农民知道国民党是地主豪绅的党，群众不要国民党而我们仍要国民党是错误的。在蒋介石叛变时，国民党的旗帜仍然是革命的旗帜，应利用这旗帜为革命旗帜不使成为反革命的旗帜。第二，对苏维埃政权口号看轻，没有指出唯一出路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对暴动没有很明确的解释，什么是暴动，如何去暴动，都没有详细解释，使以后同志不注意暴动的客观条件。这是第二个缺点。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临时的中央还主张他加入，但国际代表非常反对，这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使正当道路挽救过来，非使独秀离开不可。独秀不参加“八七”会议则挽救党脱离机会主义非常之快。这时独秀开始离开党的生活。“八七”会议在党方面说起来是一个阶段。第一次大会到第三次大会是共产主义思想运动阶段。第三次大会到“八七”会议是国民革命运动阶段。“八七”会议以后是新的阶段开始，一切路

线是反国民党的路线。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 262—267 页）

# 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

(一九八一年)

李 维 汉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的紧急关头召开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纪念我们党建立六十周年之际，回忆起当时会议的一些情况，记录于后。

## 八七会议的历史背景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曾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在一九二七年遭到了失败。

这次大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在客观方面，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包括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反对中国革命。它们的势力很强大，特别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主要集中地长江流域。在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占领武汉、南昌、南京、上海以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就伸出千百只手来，先把蒋介石拉了过去，随后又把汪精卫等拉了过去。在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领导。那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经验是很不足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还缺

乏统一的了解，对领导权的问题、武装斗争的问题、统一战线的问题，都认识不够。正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陈独秀为首的投降主义才得以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自愿地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致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要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他没有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他反对共产党创建自己领导的军队，而把国民革命军全部让给国民党去领导，并帮助国民党去扩大和巩固它。当北伐军胜利占取长江中、下游，农民革命高涨时，他又不敢放手武装农民，夺取农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却依靠上层谈判，而谈判则往往以退让、妥协告终。

陈独秀投降主义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开始，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策动、收买和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六月，汪精卫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纵容朱培德在江西强制“礼送”共产党人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出境，并派兵搜查革命群众团体；表面上决定对湖南马日事变采取所谓和平解决办法，实际上支持何键、许克祥等反动派继续实行白色恐怖，等等。这一切都是汪精卫等准备全面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

就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生反革命政变之后和武汉发生



反革命政变以前，我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到武汉就任党中央组织部长职（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调我任中央组织部长）。我到达武汉时，陈独秀还在主持工作，党中央机关内部的情况很混乱。六月三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陈独秀提出一个所谓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在政治上的最突出的暴露，是一个彻头彻尾地放弃领导权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纲领。在讨论时，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代表团中央提出一个批评这个“议决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陈独秀。陈独秀看了大发雷霆，也不传阅，就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下，用脚踏上。任弼时同志要求发言解释，陈独秀横蛮拒绝，以致大家不便多发言，而集投降主义错误大成的十一条也就不明不白地通过了。

接着，在七月四日以后到七月十二日以前，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估计这时鲍罗廷已经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斥责投降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训令，但鲍罗廷没说有这个训令。）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和我。在五人常委中为什么没有瞿秋白，我至今搞不清楚。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儿（……），老鲍（按指鲍罗廷）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他还说：“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作的《党史报告》中也说：“当时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并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就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虽然还谈不上已经是对投降主义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右倾投降主义统治我党中央的状况，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一味退让的政策。七月十三日，我党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我党同志退出政府。这是我们党改变政策的开始。

与此同时，汪精卫于七月十四日晚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七月十五日又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了革命。接着，在武汉地区公开向革命力量进攻，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不久，新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了。在这前后，罗易和鲍罗廷走了。罗易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他把在六月一日接到的共产国际给他和鲍罗廷的电报交给汪精卫看，让汪精卫找到了背叛革命的借口，所以共产国际很快就把他调回去了。鲍罗廷是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我党在七月十三日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后，他随即和瞿秋白一起到了庐山，七月下旬他从庐山回到武汉，随即回国。罗明纳兹是七月下旬到达武汉的。当时，五人常委开了一次会，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那时，五人常委代行中央职权。在五人常委掌权期

间，主要决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这里附带提一下张国焘的问题。过去只记得他有问题，但具体问题是什么记不得了。现在查阅一九二七年十月李立三写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得知原来政治局常委同意南昌起义的建议后，同时报告了共产国际。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常委派张国焘去前方传达国际电示，张借此反对起义。前委同志都不同意他的意见，经过两次激烈争论，张始同意举行。由于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都到前线去了，到召开八七会议时，在武汉的常委只剩下张太雷和我两个人。瞿秋白同志在“八一”以前已回到中央，参加并主持八七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第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五人常委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至七月下旬这段时间里决定的。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在八月三日以前就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为中央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八月三日，中央便作出决定，通知各有关省委。《大纲》明确要求在上述四省组织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起义的战略。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

议决案》时，我又向大家说明，中央农民部已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拟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这样，五人常委会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就得到了八七会议的追认。中央除通知有关各省坚决配合八一起义军的行动外，并于八月八日致电前委，指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

第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央紧急会议原来准备在七月二十八日举行，并由秋白、太雷和我与国际代表一起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困难，二十八日未能集会，而先由常委发出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到了八月三日，常委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可是，仍然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非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到八月七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便只有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

五人中央常委除了决定这三件大事之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在八七会议以前，各路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大部分到了武汉。那时我和陈乔年任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我们按照中央规定的三项办法进行安排：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还有一

小部分送往莫斯科学习。

以上情况表明，八七会议是在我党中央领导机关犯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在非常困难和非常危险的时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召开的。当时召开这个会议是完全必要的。

## 八七会议的经过

八七会议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我过去回忆是二十几个人。现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二十一个人。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就是我）等人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当时，他任党中央秘书长。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其他两个俄国同志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六天工夫。

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号（现在是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当时我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条件很注意，因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邓小平、陆定一同志也都认定这个地方是八七会议会场所在，因而现在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在这里陈列会议有关文物，开馆展览。

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由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我担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两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尔后他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由于国际代表的报告很长，加上他讲一段还得由瞿秋白同志替他翻译一段，这样他的报告就花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国际代表报告完毕，我随即向大家指出：国际代表的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一、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二、工人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五、对国际的关系问题。并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

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国民党问题，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错误。第二是农民问题，指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第三是军事问题，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他强调说，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组织问题，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

随后发言的中夏、和森、亦农、弼时等同志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

见上层，却不见群众（中夏并指出：甚至把谭延闿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亦农还指出党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和森还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自我批评说，他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弼时还指出机会主义者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秋白只对《告党员书》提了几点需要补充的意见。

发言者都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地揭发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领导的错误。由于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便建议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接着，国际代表对鲍罗廷、罗易、魏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提议对《告党员书》在原则上付诸表决。这个《告党员书》，是由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并由瞿秋白同志在八月六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在会上，瞿秋白同志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并决定以瞿秋白、我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秋白不是五人常委的成员，为什么却能代表常委向八七会议作报告？这是因为秋白在七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秋白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他提出了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更加注重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

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最后，秋白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

接着，我依次将常委与国际代表起草的三个议决案，即《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一提请大家讨论。在讨论这三个议决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议决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作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政治局应将会议讨论通过的新政策发布各地。

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五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后来，国际代表认为可将名单付表决。表决前决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二名。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九名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七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选举完毕，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八月九日，由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兆征兼管工委，我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

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



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过抵制。他在党的“五大”时，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是驳斥彭述之的谬论的，彭述之与陈独秀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批判彭述之，实际上也是批判陈独秀。在当时，这是有系统地驳斥投降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党的“五大”时，他把这篇文章发给代表们看，也送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后来，这篇文章还印成了单行本。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有的同志提出，当时应不应该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九二七年七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在这里附带地叙述一下陈独秀问题的处理经过。八七会议前后，陈独秀住在汉口前花楼，黄玠然继续在他那里当秘书。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至十月上旬陆续迁到上海，也照顾他迁居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对他的态度是对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直到一九二九年他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十一月十五日，才被中央开除出党。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如前所述，有他的“二次革命论”作为根源的。因此，他当时对待错误的态度很顽固，以致后来堕落到同托派相结合。陈独秀从一九

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下台，前后当了六年的总书记（开始称书记，“二大”、“三大”称委员长，“四大”、“五大”称总书记）。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建党初期，他是为党做了工作的，我们对他要进行具体分析，要历史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以前某些历史书把他的名字根本抹掉是不对的，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他的照片是对的。目前对陈独秀有三种看法：一说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说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说对他要一分为二。我赞成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要一分为二。

## 对八七会议的评价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不开这个紧急会议，就不能纠正我们党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就不能确定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不能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但是，八七会议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它的主要缺点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同时在组织上开始了惩办主义的过火斗争。

当时党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还属幼年，还很很不成熟。在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还不能对陈独秀投降主义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党第一次遇到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投降主义断送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拚命的精神。特别是在革命干部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却还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这种“左”倾情绪更容易滋生起来。在八七会议上，这种情绪是有反映的。会议的文件中就有“左”的东西。我自己就有一种“左”的情绪。那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

在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中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以后，便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以后在党内长期把蒋介石反动统治笼统称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才改正了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此外，八七会议还有其他的缺点，这里不再具体叙述了。

八七会议以后，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通过各种

秘密渠道迅速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各省部分地区纷纷举行了武装暴动，同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恢复、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党内刊物，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从而把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挽救出来，胜利地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到湖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党的湖南省委，建立工农武装，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他根据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把战略上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率领秋收起义剩下来的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了八七会议和后来的“六大”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156—169页）

[附录]

## 关于八七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九八六年二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 央 档 案 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以下简称八七会议），会议记录和会议通过的文件都比较齐全，会议及会议前后的情况基本上是清楚的。但是，由于会议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秘密进行的，社会上对这次重要会议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同时，事隔半个多世纪，许多事情当事人已经记不清，在近年来发表的回忆录中也出现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提法。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如下：

### 一、关于八七会议的记录

研究八七会议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现存中央档案馆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近几年来，八七会议记录的内容大部分已经陆续公布。但是，参加八七会议的代表郑超麟否认有这份记录。他在回忆录中说：“八七会议并无记录，既无专人记录，又无与会者的私人记录”<sup>①</sup>。因此，现存记录的真伪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经考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是原始记录，理由是：

<sup>①</sup>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48页。

(一)八七会议记录是当时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件。党的“五大”以后，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都专门有人做记录。例如，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就决定由瞿景白和陈昭礼负责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工作，并决定试办《每日通讯》。从此时起，中央会议记录开始保留下来。从八七会议起，中央会议记录即按日编号存档。这份记录和中央其它文件都保存在上海中央文库。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迁苏区后，由上海地下党保管，一直到解放。解放后由华东局移交中央办公厅。八七会议记录左上角盖有当时文件分类图章编号。

(二)八七会议记录用的是当时的纸张。一九二七年七月至十二月，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会议用的都是一种纸，这种纸是蓝横格白报纸，纸中有暗色外文字母(凹字)，横格宽窄不一样，但暗色字母相同。八七会议记录第十一页与八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第一页纸纹上外文字母完全一样，都是“DHBOND”。

(三)八七会议记录的内容与会上形成的文件内容是一致的。例如：

1. 讨论《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时，任弼时指出：“手工业工人以后的经济斗争应保障其胜利”，瞿秋白在做结论时说：任弼时同志的意见可另写一条。后来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第十条就加上了这个意见。

2.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讨论时，毛泽东提出在草案第七条应加一“农”字，即应以工农参加指导，结果会议通过的决议案第七条即改为“工农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同志担任这种指导”。

3. 会上瞿秋白的发言，和当时他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内容也是一致的。

(四)八七会议记录的内容与蔡和森后来的记述也是一致的。

八七会议后，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当时他在顺直省委作《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对八七会议的回忆也和记录内容一致。例如：据记录，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说：“南昌军队何以离赣去粤亦应讨论”。但会议未重视蔡和森的意见，在会议记录中没有讨论南昌暴动后进军问题的记载。这与《党的机会主义史》关于“八七会议未郑重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是一缺点。会议之末，和森曾提议讨论此问题”的记载相符。据记录，八七会议在讨论临时政治局委员名单时，蔡和森提出“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沉、达<sup>①</sup>。因要吸收新的分子”。这同《党的机会主义史》的记述也相符。

(五)八七会议记录共一万二千八百字，会上发言计五十六人次，发言有先有后，内容、语气一一记载清楚。

## 二、八七会议的会址

关于八七会议召开的地址，在五十年代曾流传过会议是在九江召开的说法。为什么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被说成是在九江召开的呢？这是因为：（1）八七会议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秘密举行的，为了保密和迷惑敌人，曾佯称会议在九江召开。周恩来一九五八年在对夏衍谈到八七会议会址时，曾专门作了解释。他说：“当时说在江西九江召开，是为了给汉口开会作掩护。”<sup>②</sup>（2）当时党中央曾有过迁往九江的打算。据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七月初“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此决定也给八七会议在九江召开之说提供了间接的依据。实际情况是，党中央机关并没有迁往九江，而是在当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陆续径直迁至上海的。（3）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到，“中央经过一个散乱的状态，转到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八七会议（这时期的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汉口）”。因为瞿秋

<sup>①</sup> 即张国焘、毛泽东、陆沉、彭公达。

<sup>②</sup> 《八七会议的会址》，见1959年5月9日《长江日报》。

白是八七会议的实际主持人，因此就造成了八七会议不是在汉口召开的误会。实际上，瞿秋白此处所说的“不在汉口”，是指从七月十三日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庭赴庐山到七月二十一日从庐山回武汉前这一段时间，而不是指八七会议开会时。

据《“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中记载：“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等到八月七日，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八七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武汉。

周恩来一九五八年在回答夏衍关于八七会议会址的询问时明确指出：“八七会议根本不是在九江召开的，因为八一起义以后，不可能再去九江开会。八七会议是在汉口开的。”<sup>①</sup>这一事实现已为许多当年在汉口工作的老同志所证实。

八七会议会址的具体地点，最早是杨之华于一九五九年指出的。她说：“八七会议开会的地点是在汉口鄱阳街当时英国惠露（罗）公司的二楼。会议设在一位俄国农民顾问的家里”<sup>②</sup>。她的回忆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后来经李维汉、陆定一等同志多次回忆、找寻，最后认定会议的会址是在汉口的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二楼（即原三教街四十一号，惠罗公司的隔壁）。这座房子是英国人在一九二〇年修建的三层公寓，当时称为怡和新房，专门租给在华外国人住。一九二七年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洛蜀莫夫住在二楼。当时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外国人居住区开会安全一些。

### 三、八七会议参加者

八七会议参加者是指会议的正式代表。过去说法不一致，例

<sup>①</sup> 国家文物局给湖北省文管会转达周恩来关于“八七会址”的信。

<sup>②</sup> 访问杨之华的记录（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如，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谈话时说有十一人<sup>①</sup>；张国焘则说“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sup>②</sup>。现在出版的党史书刊上的说法仍不一致，有的说二十二入，有的说二十一人。

根据八七会议记录，会议正式代表共二十一人：

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湖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另外两个俄国同志，根据陆定一回忆他们是牛曼和洛蜀莫娃。

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记录的记载同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五大”中央委员三十一人，其中，陈独秀未通知他参加，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彭湃、周恩来、恽代英、贺昌等参加南昌起义；彭述之、夏曦、罗章龙、刘少奇、易礼容、李涤生等也不在武汉；赵世炎、陈延年已牺牲；杨之华在武汉但未出席会议。所以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十人是符合事实的。易礼容是中央委员本应参加会议，但因共产国际代表到湖南动员他反陈独秀，他表现动摇就改约彭公达为代表<sup>③</sup>。郑超麟当时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是由罗亦农临时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第51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二册339页。

③ 李维汉同志访问记。

通知参加会议的<sup>①</sup>。王一飞为军委秘书，因军委书记周恩来及其成员聂荣臻、颜昌颐、贺昌都去南昌，只有他一人可以参加会议。

有的党史书说出席八七会议的代表为二十二二人，可能是根据《“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关于“这一会议，到者有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这一记载。据上述考证，还是应以会议记录的记载为准。

#### 四、关于八七会议产生的领导机构

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如张国焘说：“八七会议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卢福坦七人为委员”<sup>②</sup>。还有的把八七会议改组的领导机构与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中央相混同。根据会议记录，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正式投票选出的临时政治局委员为九人，候补委员为七人。

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只选举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领导成员的分工是在八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产生的。有的教科书说“八七会议选出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是不对的。至于说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则更是误传。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八月九日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管农委、宣传部和任党报总编辑，实际上负责抓全局工作，但从来没有使用总书记的名义。

<sup>①</sup> 郑超麟：《再写八七会议》（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sup>②</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二册第340页。

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在八七会议前中央改组成立五人常委会时，已实际上不存在了。八七会议未通知陈独秀参加，会议批判了他的错误，选举时没有人提他的名，自然也就取消了他的领导。在八七会议上并无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决议。

